

黌舍翹楚傳木鐸

# 學林鷗樂

學林大儒振金聲



徐復觀

嚴耕望

陳垣 孫國棟

牟潤孫

王韶生

鄧廣銘

牟宗三

向達

白壽彝

潘小磐

全漢昇

馮承均

孟森

勞幹

黎東方

王經昌

方豪



威儀抑抑 誨人不倦

## 遙念吾師徐復觀

月前在本欄憶述吾師汪經昌而提及他的外表言談時，寫道：「老師個子不高，不胖不瘦。……外形上，他沒有錢穆的儒雅，也沒有牟宗三的瀟灑；言談上，沒有徐復觀的威儀，也沒有嚴耕望的嚴肅；……」

「新亞」諸師之中，徐復觀是影響筆者最深的授業師，而他在外形言談上常常予人威儀抑抑，震懾人心的感覺。

余生雖晚，但尚幸趕及親領上述五位名師的教澤，而當中的徐師，於筆者而言，倒是真的尾班車。當年忝作徐師關門弟子，既屬有緣，更感有幸。

### 親聆教誨 感受益深

上世紀七十年代尚未進新亞研究所之時，徐師的大名，早已如雷貫耳。他敢言敢罵的性格、激濁揚清的言論，我等後輩，當然多有知聞。及後在所期間，立雪徐門，親聆教誨，感受益深。

那一年徐師在所開了一科「《文心雕龍》」。論科目，在研究所講論劉勰的《文心雕龍》，倒沒有什麼很特別；最特別之處，是課堂不設於校內，而是老師的住所。

順帶一提，當年在所期間，筆者遇到三位光是上課的做法方面已叫筆者感動萬分的老師。其一是前文提到的汪經昌老師，他身患

眼疾，視力不佳但仍堅持摸着路旁外牆回校授課；其二是王韶生老師，他教務繁忙，須於珠海書院任教，以致無暇回校授課，但仍歡迎「新亞」學生逕自跑去「珠海」，以便他乘隙晤談講授；其三是身罹絕症仍堅持登壇授課的徐復觀老師。

他們那種忘我無私，誨人不倦，但教一息尚存仍忠於教職的精神，確實帶給後輩很大激勵。

筆者雖自愧粗疏，但時刻秉持列位先師的精神，在此花甲之年，仍樂意與後進分享各式課題。

### 年邁體弱 堅守崗位

徐師開「《文心雕龍》」時，已經動完胃癌手術，在家休養。我們幾位同學按時前往徐師位於美孚新邨的寓所，在客廳裏敬聆教澤。每次開講之前，只見師母王世高夫人端上一杯熱牛奶給老師潤口補充。徐師鑑於自己手術後形神俱損、血氣不佳以致聲柔語弱，於是備有一塊小白板。每當我們面露疑惑，他就在那小白板寫上幾個關鍵字。親睹這位歲暮體弱的學者仍然堅守崗位以夕陽餘暉光照學子，怎不崇敬萬分？

他所授科目，雖然名為「《文心雕龍》」，但回顧整年的課堂，直接與《文心雕龍》有關的內容，他倒沒說太多。今天看來，這種情況可能視為偷工減料，有虧職守。其實絕非如此。

記得月前在「憶吾師汪經昌」拙文提過：「幾十年前的研究所，教學模式與今天很不相同。老師絕少在課堂上教授相關知識，因為他們都認為，我們身為研究生，理應具備相關知識，即便缺乏知識，也應自行翻閱書本。他們在課堂大都集中教導我們治理學問的法則……」



## 教導我們 治學法則

他在課堂上花了很多時間教導我們治理學問的法則。他深信，只要好好掌握法則，不論從事任何研究，哪管讀什麼書，定必手到拈來，了無畏懼。因此，在所期間的莫大得益，是學懂掌握治學法則。他日不管碰到任何課題，也從容自若，明辨肌理，識分主次。

徐師與汪師授課，明顯有別：汪師只管自話自說，徐師卻愛「問書」，往往話至中途，就稍予停頓，轉而詰問學生。

不過，當年的研究所，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如果課堂上整班學生都是同級同輩，則可自由隨意回答老師提問。如果學生之間有長幼之別，例如筆者在徐師的課堂上屬於小師弟一輩，則回答問題的「重責」，例必落在大師哥身上。

## 斬釘截鐵 一字以決

本來老師提問，學生答錯，又或答得未如理想，實屬平常。畢竟是學生嘛，犯錯乃所應當，老師何須苛責？不過，上徐師的課，情況可不一樣。

首先說明，徐師雖愛罵人，而且罵人無數，但記憶所及，他對於晚輩後學，從不責罵。不過，他那種斬釘截鐵，一字以決的回應，倒叫人不寒而慄，沮喪半天。

很多時候，真的很替扛肩回答之責的大師兄難受。眼看他一句回話還沒說完，而往往只說了半句，徐師即以柔弱但決絕的語氣說：

「錯！」當時筆者年少，而且慣受西方教學法（在所期間，同學都譏笑筆者是「番書仔」，蓋因筆者進所之前，主修西洋文學），西方老師縱使聽到學生荒誕離奇、匪夷所思的答案，而即使班上同學

哄堂大笑，老師只會微笑回答：Nice try 或 It's very interesting。然後才以開放式回應：「但你有沒有想過……」；又或：「我們不妨從這方面想想……」哪有學生話未說完，就被老師斷然否定？

## 止步轉向 以矯錯誤

當時筆者年少，既缺學養，亦乏歷練，只覺得徐師有點霸道，對學生不夠體恤。然而，當自己踏入知命之年，赫然發覺，不管在公職上提示下級，抑或在藝術上啟導後輩，也步了徐師後塵，每每聽到對方明顯錯誤的回答，便斷然說：「錯！」

原來，當自己真確知道對方是概念出錯，即 conceptually wrong，或錯於方向，我們便會斷然說「錯！」至於那些不涉對錯的課題，則不在此限。

打個比方，如果你站在中環，本想去柴灣，但偏偏上了去堅尼地城的車，不管你坐了多少個站，你仍是錯了方向，只有回頭轉向才可抵達目的地。治學之事，也是一樣，萬一錯了方向，就必須止步轉向。

## 擔心後輩 積錯難返

當然，做學問功夫，你必須在概念上掌握透徹，方可決斷如徐師。何況當年的徐師，已處於生命盡頭，而沒多久便離世，他那種焦急決斷，惟恐後輩積錯難返的心情，我們必須體諒。

徐師身為一代大儒，學問既淵且博；但他的道路，與別不同。一般學者，都是自年輕開始，便一邊教學，一邊著述。反觀他早年從事軍政，做過軍隊文官，而官拜少將；後來棄官從學，設帳授徒，埋首寫作。

徐師弟子眾多，港、台均有，但數目上當以台灣較多。關於徐師生平，網上資料頗多，茲不贅。

## 著作等身 種類繁多

徐師除教學外，亦勤於寫作，既有專論，亦有雜文，堪稱著作等身。單以筆者手執早年刊於台灣的書籍而言，可以粗分為幾大類。

其一，思想論著；計有：六十年代的《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中國思想史論集》、《公孫龍子講疏》、七十年代的《兩漢思想史》（卷一至卷三）（當中的卷一原稱《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

其二，藝術論著；計有：六十年代的《中國藝術精神》、七十年代的《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

其三，經學論著；即八十年代的《中國經學史的基礎》；

其四，雜文類，多收於九十年代的《徐復觀文存》（此《文存》收錄早已絕版的一套四冊《徐復觀文錄》內的所有文章但不包括《徐復觀文錄選粹》已予收錄者）；以及

其五，家書類，即收錄六十年代家書的《徐復觀家書精選》，以及收錄七十年代家書的《徐復觀家書集》。前者由學長曹永洋編校；後者由曹學長連同黎漢基編校。

以上僅屬坊間可以買到的徐師著作，至於其他例如五十年代的《學術與政治之間》（甲乙兩集）、六十年代的《石濤之一研究》、七十年代的《中國文學論集》及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論集續篇》等書，不是絕版，就是難在坊間找到。

徐師著作，絕大部分由學生書局印行，只有少數例外，比如《中

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及《徐復觀家書集》，則分別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中國文哲專刊」印行。

## 內地重輯 另自刊行

另一方面，內地不同出版社亦將徐師的部分文章，重新輯錄，另自刊行，例如《遊心太玄》、《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中國人的生命精神》、《中國學術精神》，而其內的文章，大都取自《徐復觀文存》及《徐復觀文錄選粹》；還有最後期的《無慚尺布裹頭歸——徐復觀最後日記》。

順帶一提，曹永洋學長於徐師逝世後向各界廣集鴻文，編成《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於一九八四年由台灣時報書系印行。書內集得文章近百篇，全由學林友好及晚輩後進提筆紀念。

其實，不論你對哪門學問有興趣，只要撿起徐師任何一本論著，都可從書內所展現的學術精神及治學態度而有所感悟，深得裨益。

## 捧讀徐書 自有別趣

再者，捧讀徐書，自有別趣。

趣？徐師選題嚴肅，治學惟謹，行文認真，何以言趣？敢問趣從何來？

原來他愛在文裏罵人。提起徐師，當年整個學術界都知道，他最愛罵人，而且是誰人都罵。哪怕你是誰，只要在他眼中有任何重大缺失，他都罵。當年掌權者及政界強人，他敢罵；文化名人，他當然罵；教授專家，他固然罵；學界翹楚，他更罵，而且每罵必狠。

徐師罵人的方式，當然不像一般潑婦莽夫，而是依據學術常識，發文質疑對方，令致被罵者語塞詞窮，無法應對，只有捱罵的份兒；又或轉以攻訐，圖求解窘。每讀及此，頓覺有趣。

有人認為他罵人罵得過於辛辣；有人認為他十分難纏。其實，只消靜心分析，就知他罵必有理，伐必有因。比方說，他罵紅學專家潘重規，是因為他認定潘重規研究方法欠通，痛惜他誤人子弟。他罵胡適學問根基不穩，出言欠缺客觀理據，是因為胡適既然貴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執掌最高學術組織，位高名大，如果言而無據，焉能為學林表率？

### 胡適學問 備受質疑

提起徐師痛罵胡適，倒是當年學林逸事，蓋因胡適恍惚是徐師恆常痛罵的對象。徐師在一九六二年《中國人性論史》初版的序言，就向胡適發炮：「胡適認為《尚書》『無論如何，沒有史料的價值』（按：引自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這大概不是常識所能承認的。」（頁三）

換言之，胡適不是學術研判出錯，而是違背常識，也即是今天所謂「犯了低級錯誤」。胡適貴為「中研院」院長，是學術界最高代表，他的言論居然被人謾罵違背常識，而偏偏確實違背常識，忒也有趣。

徐師為說明對方何以違背常識，在序裏繼而指出：「對於馮友蘭『孔子實佔開山之地位』的說法及胡適『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的說法（按：前者引自馮著《中國哲學史》；後者引自胡著《淮南王書》的手稿本），都完全不能了解。」（頁三）

把人家的說法，形容為「完全不能了解」，只有兩種原因，其一是對方學說高深，自己卻才疏學淺，以致無從理解；其二是對方論之缺據，言之無理，以致不能了解，而且是「完全不能了解。」

### 違背常識 治學不嚴

徐師此間所言，當然是指後者。按照一般情況，如果某學者認為對方立論不確，頂多贈以一句「值得商榷」或「未敢苟同」；至於反駁或詰問對方，也例必冠以「討教」、「請指正」的字眼。怎會像徐師直言「完全不能了解」？小孩年幼胡言，我們尚可用「完全不能了解」評之，但若以此評論鬻舍翹楚，學界大儒，則等同謾罵。

不過，徐師絕非只管罵人而不講道理。他在文內隨即指出「我國古代思想中的《詩》、《書》、《禮》、《樂》、仁、義、禮、知、忠、孝、信等，在道家思想中並未加以肯定，而道家以虛、無為體的思想，亦為道家以前所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則胡氏的所謂『集大成』，到底作何解釋呢？」（頁三）短短數言，簡單一詰，即證胡適的確犯了低級錯誤。

印象中，胡適是徐師罵得最多，亦罵得最狠的學術領袖。無他，胡適違背常識。看他當年為急於提倡白話文而竟然違背常識，鼓勵中文走向晚清詩人黃遵憲所言的「我手寫我口」的低劣境地，就足以給社會痛罵一生。須知某民族的文字（書面語）與語言（口頭語）相差越遠，其文化涵養就越深厚。我們當然理解，胡適當時所處身的國家，亟須破舊立新，但急於扔掉傳統包袱的當兒，總不能提倡這種「口手如一」的荒謬言論。至於他當年提出的《改良文學芻議》，也即時人所稱的「八不主義」，當中多項違反常理，因而惹來批評，招致詬病。由於此事知者極多，於此不贅。

再者，胡適從來治學欠認真，考證不嚴謹，以致他的學問功夫，備受質疑。何況，胡適貴為「中研院」院長，地位至高，而居然常犯一如前述的「低級錯誤」，因此在徐師眼中，絕對該罵，怪你不知身分，誤導蒼生。

## 胡適卻成 悲劇書生

徐師雖然長期痛罵胡適，但在一九六二年當知道這位「中研院」院長遽然辭世，便立刻停罵，反而以「一位偉大書生的悲劇」為題，撰文悼念這位自由民主的追求者。

文章首段書明：「剛才從廣播中，知道胡適之先生，已於今日……突然逝世，數月來與他在文化上的爭論，立刻轉變為無限哀悼之情。」（按：依照學林規矩以至社會倫理，你儘可抨擊某位在世的人，甚至謾罵。然而，當他離世，就必須停口，皆因對方已經沒有能力「回敬」你。如果你仍舊抨擊對方，人家就視你為缺德；你的評語，只會換來鄙夷。當然，如果你以客觀法則評論死者的學術論著，則屬另一回事。）

文內第二段隨即說明胡適是「悲劇性的書生」：「胡先生二十多歲，已負天下大名。爾後四十多年，始終能維持他的清望於不墜。……他是這一時代中最幸運的書生。但是從某一方面說，他依然是一個悲劇性的書生。……是一個偉大的書生。」

## 尊重胡適 追求民主

徐師隨後稱許胡適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我於胡先生的學問，雖有微辭（按：「微辭」是客套話；口誅筆伐才是實情）；於胡先

生對文化的態度，雖有責難；但一貫尊重他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也不懷疑他對自由民主的追求。我雖然有時覺得以他的地位，應當追求得更勇敢一點；但他在自由民主之前，從沒有變過節，也不像許多知識份子一樣，為了一時的目的，以枉尺直尋的方法，在自由民主之前耍些手段。……他回到臺灣以後，表面是熱鬧，但他內心的落寞，也正和每一個有良心血性的書生所感到的落寞，完全沒有兩樣。」

文章下半部簡評胡適畢生的光景：「我常想，胡先生在五四運動時代，有兵有將，即是：有青年，有朋友。民國十四、五年以後，却有將無兵；即是有朋友而無青年。今日在臺灣，則既無兵，又無將；即是既無青年，又無真正地朋友。自由民主，是要面對現實的；……我曾寫文章，強調自由民主，是超學術上的是非的；所以主張大家不應以學術的是非爭論，影響到自由民主的團結。」

## 無法自遏 不評胡適

徐師隨後敘述他如何無法遏止自己批評胡適：「我曾很天真的試圖說服胡先生，今日在臺灣，不必在學術的異同上計錙銖，計恩怨；應當從民主自由上來一個團結運動。我自己曾多少次抑制自己，希望不要與胡先生發生文化上的爭論；……但結果，在文化問題上，依然由我對他作了一次嚴酷的譴責，這實在是萬分的不幸。」

從徐師的剖白得知，他深感矛盾，在自由民主的團結這個大前提下，他強抑批評對方的心，可惜最後還是按捺不住，在文化議題上嚴酷譴責對方。

其實，單以這篇悼念文章而言，徐師雖然凜遵倫理，敬守禮數，沒有半字狠批對方，但可從上述引文看到他對胡適的終生評價。



首先，他稱對方為「書生」，即便冠以「偉大」二字，也只是個書生，並不是成就非凡而足可在「中研院」院長這高位上領導群儒的學者。

再者，文內絕對沒有像一般悼文，頌揚死者的學術成就，更沒表彰他對後世的貢獻，而只「尊重他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也不懷疑他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不過，徐師一邊說尊重，一邊卻惋惜對方處身在那個時代而沒有憑藉自己崇高地位而「追求得更勇敢一點」，致令自己成為悲劇書生。徐師此番蓋棺論定，昭然可見。

到了文末，徐師有感於胡適這位書生逝世而心生宏願：「我常想到，生在歷史專制時代的少數書生，他們的艱苦，他們內心的委曲，必有千百倍於我們；所以我對這少數書生，在他們的環境中，依然能吐露出從良心血性裡湧出的真話，傳給我們，總不禁激起一番感動，而不忍隨便加以抹煞。……在真正地自由民主未實現以前，所有的書生，都是悲劇的命運；除非一個人的良心喪盡，把悲劇當喜劇來演奏。我相信胡先生在九泉之下，會引領望着這種悲劇的徹底結束。」（此文見於《徐復觀雜文》，亦刊於《中國人的生命精神》）

大家看罷上述引文，不難發覺，徐師十分刻意把「我們」從「他們」劃分出來。「他們」是指那班包括胡適在內的少數書生。論學養，徐師當書生，固然綽綽有餘，試問誰會質疑？但他偏偏不以書生自居，硬把自己類分開來。估計是因為他在性格上，以至在使命上，根本不想當書生。他因此自稱「我們」，以示與書生不同路。

這篇悼文寫於一九六二年，而徐師當時相信胡適會引領望着這種悲劇徹底結束；二十年後，徐師亦不幸逝世，因此我們或許補誌一句：「我們相信胡適與徐師在九泉之下，會引領望着這種悲劇徹底結束。」

## 狠批胡適 大有人在

其實，痛罵胡適絕非徐師的「專利」。學術界狠批胡適的，大有人在。業師牟宗三就是其中一位。

話說一九八二年牟師在某次演講中提到知識分子，說道：

「胡適之先生代表一個型態。胡先生相信自由主義，宣傳的是科學、民主。不錯，科學、民主是當該的，自由主義也對。……但是這個時代表現自由主義，我們要知道應該用什麼方式，什麼型態。在這方面胡適之先生就很差。

自由主義……是一個政治概念，它的作用要在政治上見。自由主義跟著個體主義來，個體主義、自由主義講的是人權，故要扣緊人權運動來了解。這根本是政治的。西方自由主義的表現就是如此，由之而開出了現代的文明。但胡適之先生在中國提倡自由主義卻避免政治的重點，而只在社會日常生活上表現。這便是一種差離。所以胡先生，照徐復觀先生所說，是屬於『文苑傳』的人物（按：正史如『二十四史』的列傳部分，設有『文苑傳』或相關列傳，記述當代文人儒者），還是文人的底子。他以文人的底子做點考據，拿做考據來當學問，這是很差勁的。這是眼前的人物，大家都可一看便知。他……處在這樣一個時代中，不是一個健康的型態，至少不是能有重大負擔的型態。他在這個時代中享有這麼大的聲名，實在是名過其實。」（這篇演講載於聯合報叢書《中國文化的省察——牟宗三講演錄》頁六十二至六十三）（台北聯經，一九八三）

從上述講辭可見，牟師批評胡適雖然提倡自由主義，但因避免了政治重點而造成「差離」，更抨擊胡適的所謂學問「很差勁」，根本「名過其實」。他對胡適的劣評，堪堪與徐師的遙遙呼應，也是那個年代具有文化意識及學術良心的一代大儒對胡適的客觀評價。

## 「故宮」畫藏 引發筆戰

書歸正傳。徐師罵人，豈止胡適？

初刊於七七年的《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一書，就是他筆伐「故宮」及其附庸的匯編。事緣元代著名畫家黃大癡（即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真作，據稱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然而，徐師本其豐富知識及嚴謹態度，懷疑故宮所藏，可能是贗品，因此發文質疑。結果，非但沒有引起誠懇議論，反而惹來群起聲討。其一是「故宮」主事者；其二是文化名人；其三是恆常與徐師對立的人。他為此連續寫了四篇長文，一一駁斥對方所言。

這四篇文章其後收集成書，取名如上。此書所收四篇文章，依次是「中國畫史上最大的疑案」、「中國畫史上最大的疑案補論——並答饒宗頤先生」、「由疑案向定案——兼對疑難者總答復」、「定案還是定案」。

他在最後一篇文章裏炮打多人，其一，在台灣《藝術家》期刊撰文批評的台灣書畫家張光賓；其二，在《大公報圖書副刊》發文的易朴士；其三，在《明報月刊》提出反對的傅申；其四，台灣故宮博物院的李霖燦。他甚至狠批故宮博物院這個文物機構已經成為小集團。

徐師在文內第七節寫道：「臺灣有學術研究的自由，又有許多寶貴的資料……但迄今為止，在中國文化研究方面，只落得一片空虛混亂。重要原因之一，有機會參加重大文物機構研究的人，非僅自己悠遊歲月，不求長進，並且不知不覺地誤以國家的寶藏，當作小集團的產業，因而形成豪紳惡霸的心理，以豪紳惡霸，魚肉鄉民的手段，對待他們小集團以外的學術問題。」（頁一六一）

## 痛罵對方 「豪紳惡霸」

徐師把「參加重大文物機構研究的人」罵作「小集團」的「豪紳惡霸」，而他們排斥外界的行為，等同「豪紳惡霸，魚肉鄉民」。從他用字極重，可知他對那時的文化惡霸如何心痛惡絕。其實，面對各界翹楚的歪言惡行，徐師常常敢於指正，勇於批評，充分展現「良心鬥士」的無畏精神。

他繼而提及「當我的《中國藝術精神》印行，受到重視時，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李霖燦……用射暗箭的方法，說我把氣韻生動說得『太玄秘深奧』，是『一心鑽牛角尖』，『取錯了方向』。而他自己的『淺釋』，既無起碼的常識，又無文字必不可少的條理，我便……加以教訓。」（同上）

李霖燦年輕時畢業於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師從林風眠，在校期間亦得李苦禪扶助；後來成為納西文化專家。在台灣退休前位居「故宮」副院長，著有《中國美術史稿》。徐師「教訓」對方，全因為此君身居「故宮」高位，而居然論缺常識，文無條理，豈不是濫竽藝林，愧為表率？

徐師繼而提到：「此次張光賓的文章，其動機、水準，和李霖燦，是一模一樣的。張文分明是針對我的三篇文章來寫的（按：即收在前述書內的首三篇文章），但對我的論點却一條不提。……把上述這些顯明事實置之不顧，而要說出顛倒是非的謊言，這真使收藏的古物蒙羞被辱。……故宮博物院諸公推出此文，意在遮羞，而實以出醜。」

徐師繼而「回敬」易朴士的文章，而其中一點是「易先生的文章，到底還是『獨白』，還是『對話』？若是獨白，則不必提我的名字。若是對話，則何以逃避我所提出的全部論證，無一條的反駁，



而只以自說自讚為滿足呢？大陸過去尚沒有出現過這種學術討論的變態。假定易先生認為我的論證是不足辨的，也應說出不足辨的理由。例如我認為易先生此文不足辨，我下面便要說出理由。……」（頁一六四）

關於徐師因「故宮」黃大癡畫作而罵人這個課題，筆者最後引述此文的第一節作結：「在此次黃公望……兩長卷的討論中，以饒宗頤先生找材料的能力最強，以翁同文先生搜討之功最密。我則在材料的分析綜合上，稍具一日之長。而一經對方或自己發現了錯誤，立即公開承認、改正，這點勇氣，或對百十年來的學風稍有裨補……我們的討論，不在爭個人的勝負，而在爭問題的是非。」

這段文字，足以說明徐師的治學態度、人文精神及學術期望，並且為後學豎立楷模。

## 做法偏頗 深表痛心

順帶一提，「故宮」當年知悉徐師發文質疑後，煞有介事，隨即刊登對畫作的官方介紹講解，但當中居然完全沒有回應徐師的疑問，反而在文後附錄「參考資料」內引列當時由文化名人執筆狠批徐師的文章，但對於支持徐師的文章，卻付諸闕如，半篇也沒有。徐師對於這種偏頗的做法，深表痛心。以現代用語來說，這是活脫脫的文化霸凌。

其實，在「故宮黃大癡畫作事件」之前，徐師已經在報章公開質疑李霖燦的美術言論。換言之，他早已「盯上」對方。事緣李霖燦認為，但凡不復存在的畫作，就不必研究。他於是寫了一篇文章回應這種說法。文章指名道姓評論對方，而標題是「人文研究方面兩大障礙——以李霖燦先生一文為例」。

## 自我中心 一大障蔽

文章首先指出，「我們學術上的落後……除了偷巧懶惰，及因小利而出賣靈魂，失掉獨立自主的研究精神以外，還有兩大障蔽。一是『自我中心』；一是反理論反思想的傾向。」所謂「自我中心」，「指的是許多人，不僅以自己的生活態度作評論古人的標準；並進一步認定古人的性格、學問，都會和自己一樣；……」

從引文可見，徐師指的，是那些以己度人，以今論古的人。至於「反理論反思想」，大抵是指那些「知其然」但「不知其何以然」的人。這些人只管停留在目前而表面的東西，但懶得依循理論，運用思考，從而尋究根源。

他隨即提述李霖燦的主張，並「稱許」之為「果決」：「李先生似乎曾主張研究中國的畫史，只能以現存作品為對象；沒有現存作品的，便應從畫史中淘汰掉，這樣一來，便把文字記載的材料，一刀砍斷了，該是多麼果決。」

李霖燦得此「稱許」，不大為光火才怪呢！那還不止，徐師繼而就對方差不多同期發表的「南齊謝赫六法淺釋」一文，逐項質疑，逐點駁斥，煞是有趣。

此文現收錄於《徐復觀文存》（頁一九六至二零五）。但凡對繪畫特別是畫史畫論有興趣的藝友，實在值得一讀。

## 「士有三賤」 「士有三狗」

徐師罵人，何止僅罵某人某事？他甚至罵某一撮人，某一群體，以至某一現象。一九六六年他以「士有三賤」為題，痛罵三種賤士。他在文內首先引述東漢末年仲長統在其《昌言》的言論，是要「讓

大家來看沒落時代的所謂知識分子的嘴臉……：『天下之士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於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可賤。』」仲長統這段話，雖然寫於東漢時代，但仍然擲地有聲，任何時代，完全適用。

什麼是賤？且看徐師解釋：「賤是卑賤，即是沒有人格。一個時代的完全沒落，其根本原因便來自知識分子的卑賤。……人沒有不慕名的。但在衰亂時代，政府、社會，對人、對學問，常常失了衡斷的能力，及大公無私的精神，於是欺世盜名之徒，得以大行其道。」老師這番話，實在確切萬分，而且古今各代，盡皆如此。

為了識別欺世盜名之輩，老師提議「循名責實」，即是研判某人之名，是虛是實。不過，循名責實的工作，絕非輕易，自身既要有學問修養，又要有冷靜頭腦，更要有求知精神，勇於探究。可惜，上述三項條件，處身於「沒落地區的知識分子」（引述徐師用語），卻絕少擁有。

### 罵得痛快 同聲叫好

文內進而提醒大家，「慕名而不知實，會發生三種結果。」其一，大家對於的確名實相符的人，往往只慕其名而忽略他的實；其二，大家遇上名實不符的人，卻瞎捧瞎抬；其三，至於有實而無名的人，則時常受到抑壓。

徐師引用完仲長統「士有三賤」的名句而大書特書後，更在文末提出「士有三狗」的延伸甚或進階的說法。然則，何謂三狗？且看徐師列述：「這批人（按：即賤士）後面都有強力的主人；他們

之所以敢明火執仗，乃是『狗恃人勢』，一狗也。這批人有的是以主人的『狗頭軍師』自居，許多貪污（按：此處或可補充一詞：『以及諸般惡行』），是在狗頭軍師掩護下幹的勾當，二狗也。我們鄉下把不要臉的人稱為『人頭狗臉』，而他們正是人頭狗臉，三狗也。由三賤到三狗，這是歷史的大發展。」（此文收錄於《徐復觀文存》頁三二零至三二三）士子之賤，真被老師罵得痛快淋漓，大家怎不同聲讚好？

翻查徐師罵人事件簿，只要你是某個範疇的領袖人物，假如你所犯的錯誤影響深遠，他必不放過，定當口誅筆伐，撥亂反正，以免當事人禍延下代。正因如此，他罵人罵到連自己業師也不放過。四十年代末，他臨離開內地而轉赴台灣之前，力勸乃師熊十力遠走外地；可惜對方不聽。老師於是罵他不通世情，昧於實況。

### 罵熊十力 猖狂縱恣

時光倏忽，幾十年後，老師在垂暮之年翻閱熊十力於六十年代初自資刊行的《乾坤衍》；讀後冷冷罵道：「熊十力先生……立言猖狂縱恣，凡與其思想不合之文獻，皆斥其為偽，皆罵其為奸。……彼雖提倡民主，而其性格實非常獨裁。……我不了解他何以瘋狂至此。」（摘自《無慚尺布裹頭歸——徐復觀最後日記》）他這番話，與其說是失敬攻擊，倒不如視作憤慨哀言，痛惜對方墮落如斯。

筆者雖然忝為兩位老師的徒子徒孫，但此刻絕對無意介入他們的師徒恩怨；對於他們的學術爭論，亦不宜置喙；惟覺人生若走至此，怎不歎嘯？至於老師年輕時立雪熊門而被熊十力當頭棒喝的情景，則記於本文尾部。

綜觀上述不同引文，足證徐師罵人，理據鮮明，條理清晰，因而字字有力，句句鏗鏘，實足大快人心；而這亦印證本文之前所述：「文化名人，他當然罵；教授專家，他固然罵；學界翹楚，他更罵，而且每罵必狠。」

真佩服老師罵人的本領。他罵人，既勇猛無畏，全力攻堅，亦措辭狠絕，毫不留情。看他罵人，固然解氣紓鬱，有時甚至忍俊不禁。筆者眼中，老師學問修養，與罵人本領，堪成正比。

### 敢於罵人 勇於認錯

不過，徐師對於言之有理而值得尊重的人，必定客氣有禮。一如他在前述「故宮黃大癡畫作事件」上，對於比他稍後半輩的饒宗頤所提出的批評，自覺錯在己身，隨即虛懷接受，敢於認錯，而誠如他所言：「這點勇氣，或對百十年來的學風稍有裨補……我們的討論，不在爭個人的勝負，而在爭問題的是非。」

又例如，他早年執筆「中國孝道思想的形成，演變，及其在歷史中的諸問題」一文時（按：此文現收錄於《中國思想史論集》），起初推論《孝經》成於西漢武昭之際，可是他的朋友牟潤孫致函提出，他推論得太後。起初他不以為然，但經過幾年再三琢磨，終於認為對方說得正確，於是奉函道謝，感激對方不吝指正，使自己深得啟發，知所錯誤，俾使日後撰寫相關文章時更趨完善。

由此可見，徐師治學，的確虛懷若谷，遇錯必改。其實，為學做人，偶有過錯，實乃常情，只要敢認敢改，就是好漢。順帶一提，本段提及的徐師朋友牟潤孫先生，也是當年筆者在所時的老師。稍後另有專文介紹。

### 雖愛罵人 也常讚人

然而，必須申明，徐師一生愛罵人，雖然學林皆知，但他也常常稱許他人，卻少人報道。現引載一兩則，聊予對照。

其一，他在「溥心畬先生的人格與畫格」一文，不但推許國畫大師溥心畬其人其畫，更藉此申明，其實人格與畫格，二者根本密不可分。

徐師首先簡述這位滿清皇裔的身世。他年輕時兩度赴德求學，得博士學位；抗戰期間，他「大節凜然」，稱病而不參與日本所扶植的政權；四九年轉赴台灣，「雖於顛沛流離之中，未嘗一日改其度，未嘗一日廢其學，未嘗一日不著書，未嘗一日不作書不作畫。」

### 褒溥心畬 植基經學

徐師隨後在褒揚溥心畬時稱道：「先生做人植基於經學，著有《四書經義集證》、《爾雅釋言經證》，皆採以經證經的堅實方法，卓然成家……文則直追六代，詩則直追盛唐……書法植基於說文，立規於虞褚……先生之於繪事，……實與其現實生活，融為一體。……性情趣味，自然流露之於書，尤流露於畫。……格調之高。一掃董其昌後卑弱怯懦之習。……一洗近百年來繁雜單寒之體。」

他甚至因當時國畫市場對心畬先生之畫作定價不高，甚至遠遠低於其真值而滿有慨嘆，代其不值，並揚言百年後，其畫作價值，必會轉變。

這篇短文，現載於《徐復觀文存》（頁三四五至三四六）。徐師不但以高瞻筆觸頌揚心畬先生其人其格，更在文末延伸論及：「文學藝術的高下，決定於作品的格！格的高下，決定於作者的心；心



的清濁深淺廣狹，決定於其人的學，尤決定於其人自許自期的立身之地。」他對人格精準闡釋，我輩學子，當然拳拳服膺。

其二，徐師在六十年代撰文稱許陳立夫新著《四書道貫》。事緣此書刊行後，陳立夫敦促徐師寫書評。他謹遵囑咐，在六六年十一月寫了一篇評論文章，題為「評陳著《四書道貫》」，並於翌年十一月刊於《華僑日報》。

### 居夷處困 引發自省

提起陳立夫，一般學子只知他是政治家，是民國時代蔣介石的心腹近侍，隨後更官拜教育部長；豈不知他早年留學美國，在Pittsburgh大學取得礦務工程碩士學位，畢生熱衷中醫中藥，對國學亦素的心得，長年擔任孔孟學會理事長，而六十年代旅居美國期間，寫就《四書道貫》一書。（按：「道貫」一詞，是孔子「吾道一以貫之」的縮寫）

徐師在文章首段先來自嘲一番：「說來很慚愧，我著的書，在書店裏多是冷貨；而陳先生的書，則真是洛陽紙貴，風動一時。」

自嘲之後，他進而解釋「為什麼陳立夫先生乃是一科學家，政治家，並不是一經學家，而我却推重他的《四書道貫》」？老師認為「讀古典，當然要通訓詁。但並不是通了訓詁便算讀通了古典……對《四書》的理解，……必由訓詁追到人生的體驗，更由人生的體驗而追到注釋者人的自身，乃必然之勢。」老師在進一步解說之前，先「申報利益」：他其實與陳立夫並無深交，絕少親近，只是在民國三十六年曾有兩星期在上海同居於一棟房子而已。換言之，他的書評，絕不涉及交情。

### 《四書道貫》 平易親切

徐師隨即指出，陳立夫旅美期間，可謂「居夷處困」，（按：陳立夫自五十年代初就離台赴美，而旅美生活，殊不優渥，甚至緊短，時有困頓。）卻體現了「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庶乎近之。他的注重《四書》，主要是因為他在肩負黨國重任中，遇到了許多困難問題，並要解決這些困難問題，而引發了自己的反省，由這種反省而發現了《四書》的意義；……因此，他著的《四書道貫》的第一特點是平易親切，有的地方使人感到聖人好像正對着讀者講話。古典的大眾化，乃最不容易的事情。……陳先生開闢了比較可靠的古典大眾化的道路。」

此外，老師認為「立夫先生在四書中把握到了誠、仁、中三個基本觀念，以作為貫通的真實內容，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不過，筆者倒想在此越俎補充：細究其實，誠、仁、中這三個基本觀念，可用一個「仁」字進一步貫通，蓋因「誠」乃「仁」的必備條件，也根本是「仁」的外顯，而「中」就是仁者應有的定位。因此，一個「仁」字就足以貫通，而「仁」也就是人必須達至的境界。

徐師在文末指出，陳書「在結論中，很扼要的把許多人對中國文化所造成的人為障蔽，很簡明地打通了。……對現實人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陳述，實際都作了針對現代的指點，而發生了提撕、警覺的作用，應當可以引起讀者深切的反省。」（此文載於《徐復觀文存》頁一八六至一九一）

閱罷老師罵人讚人的褒貶文章，應該對這位率直認真的學者，多了明確的理解。另一方面，必須再次申明，徐師雖然罵人無數，但對於低輩後學，從不嚴責，只會認真提點。估計是他認為晚輩後進，學養不深，經驗未豐，犯錯乃必然之事。何苦責備？

至於徐師的著作，由於數量很多，範圍極廣，根本無法在此一一簡介。日後有緣，定必另文補述。筆者倒想在餘下篇幅報道他與師母相處的一鱗半爪以及他自己讀書治學的經歷。

## 撰文記敘 夫妻情趣

老師偶爾喜以文字講述兩老相處之道，甚至敘述多年夫妻情。例如他在一九七二年八月寫信給長女均琴時提及：「前幾天洗冰櫃，凍箱的冰融解後，我發現有些東西；清出來一看，原來你媽把醃了一下的魚，每個膠紙袋裝一塊，一共十幾塊，準備我好煎了吃。當時我真感動得要流下眼淚。」（見《徐復觀家書集》頁一九一）

又例如，老師在「和妻在一起」一文內，憶述他倆幾十年來的夫妻生活。他首先把二人的婚姻生活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新婚一年後，戰事便爆發。他的軍旅生活導致夫妻聚少離多，「因此常引起妻的深深怨恨。」第二階段：在台灣東海大學執教的十四年安定生活中，「當然是和妻在一起，但四個兒女，個個嬌慣，妻的精力，幾乎完全用在兒女身上，……這實際是和兒女在一起，而不能算是和妻在一起。」第三階段：當「兒女都已高飛遠走」，而自七二年定居香港，才「真正和妻在一起」。

關於與妻在一起的總體感覺，「是我們都不曾長大，而且將永遠也不會長大……兩人相接觸的語言、行動，……都帶有兒童的意味，有時我在她面前放點小賴，好像她是我的媽媽，有時……又感到她是我的小女兒。」

老師繼而在文中提述因老妻事事遷就他而常感歉疚。他說：「我的妻，是在帶封建氣氛的家庭中長大的，她從來不叫我的名字而稱我為『先生』，小孩在一起，她便一切為小孩着想，小孩離開了，

她便一切為我着想，……我幾次向她懇求地說：『你這樣將就我，使我心裡很難過。』但妻却堅持並沒有什麼事情將就我。」

## 待妻之道 求致太和

老師隨後在文末道出如何面對老妻的責罵。「我一向馬馬虎虎，在言語上得罪了她自己並不知道。她總是忍上兩次三次；最後發作出來，就會狠狠地數罵一番。么兒在身邊時，他便乘機煽火地說：『媽！你這次不要輕易放過爸爸，不要聽爸爸說一兩句笑話你就心軟了。』……妻一發了脾氣，常把二三十年前的雞零狗碎的事情，都羅織成為當前的罪狀。有時真是氣死人。但第一，因為她身體不好，我不能反口去刺激她。第二，我知道她發過脾氣後，很快就會後悔的……『百忍堂前有太和』，所以我和妻在一起，總算過的是『太和』的生活。」（此文原刊於七七年《星島日報》，後載於《徐復觀雜文》）

我們準可從這篇文章領略老師待妻之道以及夫妻充滿「太和」的相處之情，讓我們這班學子在仰承師訓之餘，瞭解老師與師母夫妻共處以至闔家生活的意趣。

不僅如此，夫妻相處，老師居然偶爾對妻子耍奸使詐。且看他在七十年代寫給長女均琴的信裏，剖白他的奸計：「今天你媽……隨意清東西，清出我過去兩次寫給你媽的悔過書，你媽笑了給我看，其實我當時也弄了點手腳，故意寫得似通不通的。你媽笑了一陣後，一起扯掉了。」（見《徐復觀家書集》頁二六零）

原來他們夫妻之間也搞「悔過書」的玩意，而且還在悔過書上動手脚。夫妻相處的情趣，溢於紙上。後輩讀之，頓覺溫馨。

另一方面，師母固然是賢妻良母，除了照料老師起居飲食，還不時充當他的左拾遺，從旁提醒他注意因事忙而一時無暇兼顧的資訊。她的拾遺差事贏得丈夫暮年在日記稱許：「年來世高常以某些新聞或文章提醒我，都很有意思。」

## 師母撰文 憶念亡夫

老師離世後，師母在孀居期間親撰「友情默默感時光」一文，憶念亡夫。師母以淡淡的愁思，幽幽的情懷寫道：「從您辭世那一頃刻開始，與我生命相伴隨的，無法言喻的佷依之情，也與您的形體相偕俱去。這麼多年來，我的生活只為照顧您，培育四個兒女而生，如今孩子們都長大成家，遠在異地，突然在生活的核心中失去您，這種岑寂是何等難耐。」（此文載於前述《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頁五七一）

文內輕輕數言，便道出夫妻相依相伴，彼此情真意摯；淡淡幾句，我們便充分感受到師母大半生相夫教子，堪堪彰顯了賢妻良母的傳統婦德；短短百字，卻道盡喪夫後生命失去核心，深嘆孀居何其寂聊。

師母隨後續憶：「……任何獨處的時刻，浮現縈繞在我腦海中的總是您在書齋裏埋首研讀，撰述的影像；您留下的那些歷經歲月，累積醞釀的研究成果。那些文字有的我不十分懂，有的則全然不能了解，然而我知道為了學術，為了堅持自己的原則，您的確得罪過不少人。您秉性雖然剛烈耿直，可是從來不記仇，從來不暗地裏算計人，您生前常說，歷史和時間終究會揭開飄忽不定的迷霧，顯示它凝定清晰的面貌。」（頁五七一至五七二）

雖然寥寥數語，卻表明自己對丈夫一生的評價及認定，亦印證了我們這輩學生對老師性格的理解。際此，只想遙稟老師，時光飛逝，綜觀您辭世四十年後的今天，歷史和時間不但揭不開「飄忽不定的迷霧」，歷史反更模糊，時間益覺乏力。

## 自我憶述 讀書生活

至於徐師的讀書經歷，據他在「我的讀書生活」一文憶述，他早年初遇熊十力，就被對方棒喝當頭，大罵他沒有把書讀好，而他們所指的書，是王船山的《讀通鑑論》。當對方問徐師，有什麼心得，他就把不同意書內所說的地方，逐一提出。怎料對方罵他：「你這個東西，怎麼會讀得進書！任何書的內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你為什麼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專門去挑壞的；這樣讀書，就是讀了百部千部，你會受到書的什麼益處？讀書是要先看出他的好處，再批評他的壞處……」

他續憶，自己受過棒喝，經過熊十力「不斷的錘鍊，才逐漸使我從個人的浮淺中掙扎出來，也不讓自己被浮淺的風氣淹沒下去，慢慢感到精神上總要追求一個什麼。為了要求一個什麼而打開書本子，這和漫無目標的讀書，在效果上便完全是兩樣。」（順帶一提，關於徐師憶述與乃師的關係，可參閱「有關熊十力先生的片鱗隻爪」一文。此文現收錄在前述《徐復觀文錄選粹》內，另見於內地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編印的《中國人的生命精神——徐復觀自述》。）



## 提醒後輩 多加寫作

老師早在五十年代就以「為學習而寫作」為題，解釋寫作如何有助學習。他在文內初段說：「做學問最基本的工作，首在搜集資料，整理資料，把資料加以消化。……其次……是要養成自己的思考能力……當你有某種感想，經過初步的思考而覺得其值得寫出……你的思考力便隨著文章的展開而展開，隨著文字的鍛煉而鍛煉……所以『寫』是發展鍛煉思考的重要方法。」

他隨後有感而發：「一生讀書而不肯輕易寫一字的人，站在做學問的觀點來說，是最吃虧的事。」他因此特別提醒後輩：「應養成隨時觀察事物特性的習慣……應養成隨手抄錄資料的習慣。」最後，他在文末總結：「為了學習而寫作，以學習的心情來寫作，可能是流弊最少的寫作。」

另一方面，徐師到了中年而飽經歷練後，「摸出了一點自己的門徑。第一，……決不讀第二流以下的書……。第二，讀中國的古典或研究中國古典中的某一問題時，……把可以收集得到的後人的有關研究……先看一個清楚明白，再細細去讀原典。……第三，便是讀書中的摘抄工作。一部重要的書，常是一面讀，一面做記號。記號做完了便摘抄。」（見前述「我的讀書生活」一文）不過，徐師所提出的治學門徑，對現代學子來說，未知是否有所啟迪，可予仿效？

## 常勉我輩 要多讀書

文人愛書，自不待言。一九八一年一月，老師儘管自知來日無多，但購書之樂，仍絲毫未減，並在日記寫到：「所買之書，未必能讀。然買時感到快慰，不買如有所缺欠。」他甚至因此賦以打油

詩一首自況：

「死壓床頭尚買書，分明浪費也區區。  
莫愁死後無人讀，付與乾坤飽蠹魚。」

另一方面，徐師晚年時表示，他後悔年輕時浪費很多時間讀那些與他擬研究的課題無關的書。不過，筆者很想提出，縱使你有志於學，但什麼是一代大儒所指的一流及二流書？又，究竟什麼是二流以下的書？相信一般學子根本無從辨識，以致常常讀錯書而枉花時間。

再者，讀那些與自己擬研究的課題沒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書，真的是浪費時間？試想，在漫長的閱讀歲月中，如果不是常加開拓，多所涉獵，又怎可以易於酌定擬研究的課題呢？這些想必都是現代學人同感疑惑的問題。

徐師到了暮年，師母問他，讀了一輩子書，究竟有什麼使命。他回答：「承先啟後。」今天，他的一眾弟子已經承先，接過了棒，肩負了啟後的重責。再者，老師離世前不久，還引述孔子之言：「學而不已，闔棺乃止」，並永遠視此種精神為他的鞭策。

此刻，縈繞腦際的，是老師當年上課時說得最多的一句話：「你們要多讀書！」

（「新亞」學者系列之二）

講學認真 語帶笑容

## 敬憶吾師全漢昇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新亞研究所是著名學者薈萃之地。當時雖然唐君毅已經離世，但所內大師多不勝數。單以歷史學者而言，就有多位，包括時任所長的孫國棟、主治制度史的嚴耕望、專研政治社會史的羅夢冊，經史兼擅的牟潤孫，以及專治經濟史的全漢昇。此外，國學大師錢穆不時從台北來港，向一眾學子講學。這個強大的史學陣容，敢稱睥睨學林，而筆者廁身其中，實感受惠匪淺。

這裏所說的受惠，可以分為直接和間接兩種。直接，是指在所期間修讀某課程而在課堂上親聆教益；間接，是指雖然沒執弟子之禮，但當時學風所及，諸位老師的著作，定必抽空翻閱，從中拜領。

### 「新亞」文史哲不分家

筆者進所之時，主修文學。不過，「新亞」所揭櫫的辦學宗旨，是文史哲不分家。換言之，即便你主修文學，但進所之後，起碼首兩年，除文學科目，總得選修歷史和哲學科目。根據當年的學制，研究生在所頭兩年，必須修讀文史哲裏的若干科目。如果兩年之內修不完，就要在第三年以至第四年修畢。

由此可見，當年研究所的學制，與今天的很不一樣。目下，念一個碩士學位，莫說是兩年，即使是一年半，學生也嫌長，最好是一年；如果十個月修畢，則屬最佳。以當年的學風而言，進所時，

我們從來不問，「多久可畢業？」反之，我們例必提問，「我可以在所裏待多少年？」只因為，好不容易才考進來，當然希望在這個學風頗盛的研究所，多待幾年。

當年的「新亞」，固然需要考入學試，而且由於學額有限，收生很緊，考關很不易過。誠如前述，「新亞」文史哲不分家，三者並重，而這個原則，早於考入學試時已予體現。入學試考五科：中英文外，文史哲各一。某一科可以不及格，但平均分必須及格，否則無緣面試。筆試後，所方按考分排名次，而所考名次，會在面試告知。面試時是兩師會審，輪流詰問。考生也要提述研究計劃及論文綱要。

### 基礎牢固 一專多能

不過，一如前述，不管你選修什麼，文史哲科目，必須修讀。在這種學制下，筆者除修讀文學科目，還修了不少史學和哲學科目。這種文史哲兼重的做法，其他大學裏的研究所根本欠奉。國學範疇宏大，始終要分工分門，所謂業有專工嘛。不過，如果在文史哲這三大範疇打下牢固基礎，確必有利於個人日後的學術發展。哪管你今後在學術上走哪一條路，你寬闊廣博的知識基礎，永遠是一種其他人盼羨不已的優勢，也給予你暢通無阻的方便，更為你鋪上一專多能的道路。「新亞」育人的苦心，絕對值得崇敬；我們深受福澤，當然感激萬分。

以筆者過去三十年的藝術工作而論，每當在公開場合演講完畢，總有人趨前求問：「我對某個劇種（例如京劇）有點興趣，請您介紹一本入門書給我，可以嗎？」

碰到這個表面看來合理的問題，筆者總是帶着笑容跟對方說：「問題不是這樣問。你要是對京劇產生興趣，就應該先了解京劇的整體發展；你了解京劇的整體發展，就應該先了解戲曲的整體發展；你要了解戲曲的整體發展，就應該先了解文學的整體發展；你了解文學的整體發展，就應該先了解歷史的整體發展。如果你對歷代的治亂興衰、典章制度、文學藝術，以至我國核心價值，包括儒釋道三家思想，沒有通盤認識，任憑你花盡畢生精力，鑽研京劇，也只落得膚淺短視，永遠達不到上乘。」聽到這一大番話，對方大都面露難色，頹然而去。

再舉一個例子，某年有一位後進拿着她一篇比較皮日休與陸龜蒙的碩士論文前來，請求斧正潤飾。筆者問她，大學本部或研究所期間有沒有修過歷史，特別是唐朝以至其前其後的歷史。她只是搖着頭說沒有。筆者於是喟然嘆曰：你對皮、陸二人的時代背景也摸不透，怎去研究他們呢？你寫的論據，夠踏實嗎？

## 卓然有成 飲譽學林

舉以上兩個例子，無非是要說明修讀歷史的益處。筆者在所期間，有幸修讀歷史，更蒙經濟史名家全漢昇教授在其「中國經濟史」一科裏，講授經濟史上的諸般課題。全老師在經濟史的領域裏卓然有成，飲譽學林。在敘述老師之前，必須首先指出，由於內地採用簡體字，學界把他寫成全漢升。其實他的正確姓名是全漢昇。

清楚記得，老師個子不高，衣着整齊。穿西裝時總是繫着領帶。他講學認真，但不偏於嚴肅，反而常帶幾分笑容。說話時，總是從容不迫，不像某些老師，課堂上恍如黃河決堤，浩瀚奔放。由於他是廣東人，堂上自然是以粵語授課。我們這班「香港仔」，當然倍

感親切，蓋因其他老師講話時，總帶着程度不一的鄉音。他在課堂上愛與學生分享他的研究心得。我們坐着細聽老師一點一點地縷述，既覺受益殊深，更感榮幸萬分，畢竟當年在贛舍教授經濟史，確以他為尊。

可惜，課程初段，筆者沒有敬誠其事。記得老師交付我們第一份正式的功課時，准許我們自由選題，寫一篇幾千字的論文。筆者為圖方便，故意選先秦經濟為題，因為寫先秦經濟，只消從《史記》、《左傳》、《戰國策》等古籍左搬右抄，就可成文。反觀，如果選唐宋或明清經濟，需要翻閱的史料較多，有點划不來。論文未幾順利寫就，交功課時，心裏居然還有幾分沾沾自喜，覺得自己挺聰明，懂得取巧。

## 筆者取巧 慚愧內疚

然而，當筆者從老師領回這份自忖是「傑作」時，他淡淡說：「可徵的史料有限，寫了也沒什麼意思。」看着他那種略帶「拿我沒法」的無奈面容以及露出幾分鄙夷的眼神，筆者既慚愧，又內疚。慚愧，是因為躲懶而心存取巧，枉作研究生，愧為新亞人；內疚，是因為難得幸遇名師，卻平白放棄從修改功課中仰蒙教澤的良機。

自從那句冷評以及那臉鄙夷，筆者銳意習史。多年下來，益發覺得，只要有穩固的歷史根基，不管你從事哪門研究，總是比較容易得心應手。

筆者再舉一個近年的例子，說明認識歷史是何其重要。六、七年前，筆者連同一班公務員前往內地，參加北京大學研究所的國情研習班，當中有一科是新中國經濟發展，由五十年代初講起。可是，由於從香港去的學員對新中國的瞭解明顯不足，教授講課倍感吃力，



在講論經濟議題之前，總得花大量時間交代歷史背景。如此一來，教學進度大受障礙。所以說，缺乏歷史知識而貿然從事學問研究，根本寸步難行，豈能求成？

此刻回想，誠心感謝全老師當年猶勝棒喝的冷冷一眼，讓筆者知恥而勤修歷史。自此，筆者從頭學史，先瞭解歷朝更迭，治亂興衰，進而研習各代典章制度、社會民生、財政經濟、交通建設、文化學術。

## 先研唐宋 後治明清

然則，全老師本身的習史之路，又是怎樣的呢？據悉，他年輕時與很多熱血青年相同，鑑於國家積弱，社會紊亂，於是用心研究晚清歷史，冀能找出振興之路。由於他勤修苦幹，用功殊深，遂得政治學者陶希聖、史學名家陳受頤以及當代大儒傅斯年（亦即後來台灣著名歷史教授傅樂成的伯父）等學林翹楚提攜扶助，得到更好的修史機遇。

他繼而專研唐宋，並上及六朝，下開元代。及至四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初，先後數度赴美以至歐洲遊學考察，開始著心於中國與外國的經濟貿易，進而研究明清兩代的內地經濟以及中外經濟關係。由於他心思縝密，務實無偏，因此研究成就非凡，後學廣承蔭澤，學林更視他為經濟史學祭酒。

老師除了日常講學，啟導後輩，還發表大量研究文章，而他部分的著作，收錄於一套三冊的《中國經濟史研究》。這是全老師在不同年代撰寫經濟史文章的彙編，歷年出現不同的印行本。筆者手執的，是七十年代「新亞」親自印行的初版。

那個年代，「新亞」除了學報，亦出版書籍，而所刊書籍，會送至台灣、美國等地售賣。以一九七六年初版計，一套三冊的售價是三十六美元。所內學子享有折扣。書內所輯錄的，是早年散見於各式期刊的論文，而那些期刊，大抵可分為三個體系，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般簡稱為「史語所」）集刊；「新亞」體系內的新亞學報、新亞書院學術年刊、新亞生活雙周刊；以及其他著名學報期刊。

## 採用西方經濟時期劃分法

《中國經濟史研究》共有論文及專刊二十一篇。當中篇幅最長者，是卷首的一篇，即「中古自然經濟」，而這篇文章最大特色是把西方的經濟時期劃分法應用於中國。根據德國經濟學家 Bruno Hildebrand（一八一二至一八七八）以及幾位西方學者的劃分法，人類的經濟可劃分為三個時期，即以物換物的自然經濟期、貨幣時期及信用時期。

老師把漢朝以至唐初劃成自然經濟期，而盛唐時代的中國，已走進貨幣經濟期。這篇文章寫於四十年代初，而由於自清末民初西潮東漸之後，我國不少學者傾向引用歐美學術概念去研究本國問題。據老師自述，他這種做法，是上承他恩師陶希聖。

這套《中國經濟史研究》主要是按朝代而分成三冊；上冊除前述「中古自然經濟」，還收錄了唐宋兩朝有關物價變動、政府歲入與貨幣關係及運河的三篇文章；中冊則收錄了關於唐宋明清四朝官吏私營商業、寺院經營工商業、白銀、糧食價格等課題的八篇文章；下冊則主要收錄近代及晚清有關農業、工業、鐵路等課題的文章。

## 官吏私營商業 絕非限於宋代

此三冊共收文章二十一篇之多，要在此逐一介紹，實不可能，只好酌選其中一篇對現代讀者而言應感興趣的文章，即中冊內第一篇——「宋代官吏的私營商業」，蓋因「當官營私」是歷代常存的課題，而絕非限於宋代。

老師把這篇長達七十多頁的論文分成九部分，計為：「五代官吏之私營商業」、「官吏私營商業之原因」、「海外貿易之私營」、「邊境貿易之私營」、「外交官吏之私營」、「綱運官吏之私營商業」（按：綱是指一批米的運輸）、「專賣品貿易之私營」、「其他各種商業之私營」、「官吏私營商業之特色及其影響」。

由於文內的「官吏私營商業之原因」比較吸引讀者，筆者在此敘述老師所列載的幾大原因：

（一）宋代官俸太少，不足以養廉，所以官更多貪污，而私營商業就是貪污的表現；

（二）邊將擁有重兵，他們私營商業，中央也無可奈何；

（三）唐朝商人地位不高，因此官商涇渭分明。到了宋代，商人地位躍升，本來不恥與商人為伍的官吏，基於厚利，並仰仗自身權勢，居然自行營商；

（四）宋代打破了「市井子孫不得仕宦」的傳統規矩，商人及其子孫可以買官，亦可以結交權貴，以博取高官厚祿。

老師進而指出，官吏為了方便私自營商，不惜以公款作資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的原料，以官船運載私貨，利用公家人力，藉勢壟斷，或賤買貴賣，以及逃稅。官吏私營商業，至終引致政府損失，真正商人損失商機，以及官吏頓成暴富。

一如前述，官吏私營商業，絕非一朝一代，而是歷朝歷代的問題，亦是中國歷代嚴重秕政之一。為了杜絕官吏仗勢斂財，高薪養廉似乎是不二法門。

## 《經濟史論叢》出版較先

必須申明，上述一套三冊《中國經濟史研究》所收的文章，頗有撿拾遺珠的味道，蓋因在出版此書之前三年，老師把他手上的一批文章結集成書，題為《中國經濟史論叢》。

書內收錄三十多篇從唐宋至明清的研究文章，當中以清朝經濟著墨最深，超過全書的一半，而有元一代，則少有論述，全書專論元朝經濟的文章，只有「元代的紙幣」一篇。

此《論叢》初刊於一九七二年，比前述亦即刊於七六年的《中國經濟史研究》較早。不過，筆者在所時，《論叢》早於所內售罄，而坊間亦無從購買。及至九十年代及二零一零年代，台灣及內地先後將之分一、二兩冊重印，使這套早已絕版的《論叢》，得以再度面世。

由於筆者早年先購得上述七六年刊行的《研究》，而後才購得七二年《論叢》的再版，因此本文按照筆者捧讀老師著作的先後而介紹，並非依循這兩套文集的出版先後。敬希鑑察。

## 論述宋金之間的走私貿易

縱觀《論叢》內所收文章，筆者最想在此介紹的，是載於第一冊內的「宋金間的走私貿易」一文，純因《論叢》內的文章，例如「清中葉之前江浙米價的變動趨勢」、「清雍正年間的米價」、「乾隆

十三年的米貴問題」，盡屬專題文章，只適合專研清代經濟史的後學；反觀走私這個課題，現代讀者應該較有興趣。

此文初寫於民國二十八年，後於民國三十一年重寫。事緣老師閱罷日本經濟史學者加藤繁「宋金貿易論」一文，覺得該文「對於宋金間的走私貿易，語焉不詳」，於是執筆為文，根據《宋會要》、《金史》、《大金國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等相關史籍，寫就此文。

文章共分六節，除第一節「概說」及第六節「結論」之外，依次是「飲食品的走私貿易」（包括糧食、茶葉、鹽和薑）、「軍需品的走私貿易」、「金銀銅錢的走私貿易」及「其他各種物品的走私貿易」（包括書籍和布帛）。老師在第六節即「結論」而不是在第一節即「概說」裏提出幾個重要課題。

首先，為什麼宋金之間有大規模的走私貿易，而規模比歷代大得多？

探索箇中原因，須從史地兩方面著眼。鑑於中國河流特別是最重要的河流如黃河、長江等，都是自西向東流，而不是自北向南流，因此大大妨礙南北經貿貨運及文化的互通。

開鑿南北運河是解決天然河流少通南北的問題，而自運河開鑿後，「南北水道交通發達，南方富庶的物產……可大量供給北方；而北方物產的南運，也跟着較為發達。這樣一來，……南北經濟……差不多構成一體。……但自運河促成南北經濟統一後，大體上說，統一在中國政治上是常態；分裂是變態。其間最明顯的分裂，要數到宋、金對立（約共一百多年），……當宋、金對立的時候，南北分裂的政治組織既不能滿足全國經貿密切聯繫的要求，自然要另謀所以補救之道了。」（頁二六九）

明白了中國大型河流並非北向南流的地理因素，繼而理解到南北分裂的歷史情況，我們才可以初步知道宋朝走私貿易何以異常鉅大。

### 「榷場」難以應付整體需求

宋金之間的經濟往還，雖然有官方的「榷場」（按：宋金兩國以淮河為界，而那些設於淮河流域而受官方管制的兩國貿易市場，稱為「榷場」，意指「專賣場」。見《宋會要》「食貨」三八紹興二十九年九月七日條），但「榷場」的經營由於受到兩國法規約制，根本難以應付整體需求，因此「榷場」以外的走私貿易，便應運而生。

老師亦在文內指出，走私的主要動機，是謀取巨利。南北兩方的物品礙於供需失調而價格相差很遠，因此很多人看準機遇，走私貨物，圖謀暴利。當時走私的人，可以分成幾大類：來往南北的商人、邊境官吏、出使的外交人員及邊防軍人。

至於走私的物品，種類很多。由南進北，大多是糧食、茶葉、軍用器材、銀兩、書籍等；由北進南者，大多是鹽、麥、麵等，而走私的路線，則以宋金接壤之地即淮河流域一帶為主。另一方面，漢水流域、四川與陝西之間以至海道，走私問題亦很嚴重。

老師在文內提及走私糧食時指出：唐宋兩朝，長江三角洲是全國最重要的穀倉，每年均有大量穀米從運河輸往北方各地。然而，及至宋金對立，南宋政府禁米出口，北方糧價激增。礙於運河無法暢通，走私者改循海道北運。

至於川陝一帶，由於南宋駐有軍隊，糧食需求量大，加上江南運米入川，甚是困難，因此當地政府只好默許甚至獎勵糧食自北秘



密入口。其實，一言蔽之，但凡物品因兩地阻隔而出現價差，就有貪圖利潤的人，從中走私謀利。

這篇文章老師寫得淺白易懂，讀之有趣；對於認識宋代經濟，亦頗有增益，實在值得一看。

### 《中國近代經濟史論叢》九六年刊行

老師繼《中國經濟史論叢》及《中國經濟史研究》，於一九九六年另外刊行《中國近代經濟史論叢》，將之前二十年內先後撰寫而散見於各地期刊的二十五篇關乎明清兩代經濟史的文章，結集成書，合共四十八萬字。

在這二十五篇文章當中，涉及國內經濟者，有十篇，而論及中外經貿者，則有十六篇。單是以中外白銀交易為題的，就有六篇。不過，眾多文章中，一般讀者應該對「略論新航路發現後的海上絲綢之路」一文，最感興趣。

此文是一九八六年八月老師在中央研究院舉行院士會議時的講稿。全文共分五節。他在文內首先說明，歷史上，絲綢之路有兩條。頭一條始於漢代的陸地商路。由於這條橫跨歐亞大陸的道路要經過高山、沙漠、草原等各種不同陸地，而每個約有三十頭駱駝的運輸隊，合共只能馱負九噸左右的貨物，加上走動緩慢，運輸能力低下，效率不佳，以致絲綢售價極為昂貴，甚或與黃金同價。

### 海路輸出絲綢 始於漢代

以海路輸出絲綢，亦始見於漢代。據《漢書》所載，武帝一朝，我國已有海船從廣東雷州半島開出，經現今越南、泰國、馬來西亞，

橫越印度洋，而到達印度南端。船上載有黃金、雜繒，以換取各國明珠、璧石、琉璃及奇珍異物。

不過，及至世界航道發現後，海上絲綢之路才特別活躍起來，而促進海路貿易頻繁的兩個國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

葡萄牙自十五世紀中葉開始，沿非洲西岸探險，繞過非洲南端好望角而橫渡印度洋，終在一四九八年即明朝弘治十一年到達印度西岸，輾轉至一五五七年即明朝嘉靖三十六年，得到中國批准，定居澳門，以便通商。

### 以菲律賓作基地 與中國通商

另一方面，西班牙哥倫布在一四九二年橫渡大西洋，隨後在墨西哥殖民，並於一五六五年橫渡太平洋，佔據菲律賓，並以此作為日後與中國通商的基地。

據老師所指，由一五六五年至一八一五年，西班牙每年均派遣可載重千多至二千噸的大帆船從墨西哥前往菲律賓馬尼拉，多則一年四艘，少則一艘，而以兩艘居多。所載貨品，不一而足。從墨西哥及秘魯輸往菲律賓者，以白銀佔多；由菲律賓輸往美洲者，則以生絲及絲綢為主。

文內隨後指出，明朝流通的貨幣「大明寶鈔」，由於自明中葉起發行過量導致幣值大跌，人民為保財值，轉而以銀交易。可是中國銀礦不豐，供不應求，以致不少商人轉與菲律賓的西班牙人通商，以對方需求甚殷的絲綢，交換己方所需的白銀。

## 美中之間有海上絲綢之路

老師因此在文內指出：「橫越太平洋的大帆船，一方面把銀價低廉的美洲和銀價高昂的中國聯繫起來，他方面使中國大量生產的生絲和絲綢在美洲擁有購買力強大的市場，跟着這條海上絲綢之路也就蓬勃發展起來。」（頁八十七）

關於中國明清兩代的白銀問題，老師在不同時期的多篇文章內均有論述，而這篇論述海上絲綢之路的短文，主要說明，除了橫通歐亞的陸上絲綢之路，美洲與中國原來有一條不大受到注意的海上絲綢之路，而這正是他這篇文章的要旨。

上述先後印行的《中國經濟史論叢》、《中國經濟史研究》和《中國近代經濟史論叢》，可說是老師經濟史研究的總彙。

### 《明清經濟史研究》收講稿六篇

此外，老師仍有一本傳世之作，名為《明清經濟史研究》（聯經出版社，一九九四）。書內收集他於一九八七年應台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杜正勝所長邀請出席文史講座的講稿，每講一篇，共得六篇文章，分上下兩編。上編即前三篇分論中國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交通與貿易；下編即後三篇則分論清代人口與農業、貨幣與物價及近代工業。

以第一講即「中國與葡萄牙的交通與貿易」為例，老師在開端說明，葡萄牙在十五世紀最後三分之一的時期，開始沿着大西洋的非洲海岸探險，先於一四八八年抵達南端好望角，後於九八年到達印度西岸加里庫特（Calicut），再於一五零一年及一一年，先後佔領果亞（Goa）及滿刺加，即今馬六甲（Malacca），及至五七年，佔領澳門。

本來，把上述文字放在這篇中葡交通與貿易文章的開端，作為引言，實在絕對合理。不過，他在同段後半部提出，早於葡萄牙自西向東航行，中國明朝在十五世紀最初三分一的時期，鄭和已從中國出發，橫渡印度洋，抵達非洲東岸，而中葡彼此航線長度，同為一萬五千英哩左右。

### 暗示中早於西 中優於西？

他雖然沒有明言，以航海遠行而言，中國早於西方，因此中優於西，但從他字裏行間，不難發覺，那種中早於西，即中國遠航比你們以葡萄牙為代表的歐洲還要早半個世紀而因此中優於西的姿態，溢於紙上，且看：「……葡人東航是在十五世紀最後三分之一的時間，他們的……新航線長度約為一萬五千英哩。在此半個多世紀之前，在十五世紀最初三分一的時間，中國……直達非洲赤道以南……的地方。這條由亞洲到非洲的航線亦約為一萬五千英哩，與葡人在五十多年後發現的歐、非、亞航線長短大致相同。」（頁三）其實這是專治經濟交通（即廣義的文化交流）的現代中國史家的常見態度。

老師隨後在文內講述葡萄牙人在明朝與鄰國西班牙的商業關係，以至中葡之間的貿易情況。

西班牙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在美洲大肆開採銀礦，並把採得的白銀大量運回本國。由於歐洲其他國家的物價遠遠低於西班牙，於是將自己的貨物大幅輸向西班牙，從而套取該國白銀。「最靠近西班牙的葡萄牙，自然向西大量輸出貨物，把西班牙人手中的銀子賺回本國。……他們又在亞洲把香料運回歐洲，控制了歐洲各國的香料市場。葡人把大量香料賣給西班牙，自然換來巨額的白銀。」（頁七）

## 葡人把大量白銀運亞

另一方面，由於東方的白銀價格比西方高，葡萄牙人把大量白銀運往亞洲。據老師指出，在十六世紀八十年代，每年運來遠東的白銀，高達三萬二千公斤。當時葡萄牙人抵達澳門後，就北上廣州，收購絲綢、生絲等物品，而中國商人亦趁此把麝香、水銀、硃砂、糖、樟腦、黃銅、茯苓、陶瓷等物品賣給葡人。

據悉，在一六零零年，每艘葡萄牙商船離開澳門時，船艙例必有生絲千擔、絲綢萬匹（按：五碼為一匹）、黃金三四擔。帶走的各款物品利潤很深，以生絲為例，廣州賣價是每擔八十兩白銀，但到了印度，可賣二百兩。

老師隨後在文內指出，葡萄牙由於在一六四一年被荷蘭打敗，失卻中葡航道之間的要塞馬六甲，葡人的商業利益自此大為縮減。

此外，老師在「中國與西班牙的交通與貿易」一文內指出，由於美洲白銀大量流入中國，致使國內白銀流量激增。明中葉以後，內地各大城市均可用白銀作貨幣，而政府在推行新賦稅法即「一條鞭法」時，實行以銀納稅。

由於這六篇文章是講座的記錄，現場講座之後的一問一答，亦記錄在內，而綜觀這六個講座的內容，實在有助學子理解明清兩代經濟史。

## 王業鍵敘述老師重要貢獻

以上四款書籍，均有不同版本印行。香港、台灣及內地大型書店以至網上應該可以買到。萬一找不着，各大圖書館肯定存有，尋索不難。至於論述全老師對經濟史學上的偉大貢獻，可參閱王業鍵

學長的「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一文。王學長在台灣修業時曾追隨全老師，是老師的得意門生，對經濟史研究，用功殊深。老師辭世時，他親撰一聯，敬表哀輓。聯云：

窮探南北運河糧食供輸 析唐宋國運盛衰 士林同輩北斗  
精研中西海道絲綢貿易 察明清經濟變革 學壇共仰高山

短短一聯，庶幾概括老師一生研究範圍及學術成就，亦代表同門一眾弟子對老師的崇敬。王學長惜於一四年辭世。台灣後學陳慈玉為此從各地廣集經濟史文章，編成《承先啟後：王業鍵院士紀念論文集》，在一六年推出，藉申敬意。

## 學長廖伯源編《邦計貨殖》

另一方面，「新亞」廖伯源學長為紀念老師誕辰一百周年，特意在二零一三年廣徵各地鴻文，編成《邦計貨殖：中國經濟的結構與變遷——全漢昇先生百歲誕辰紀念論文集》。書內收集各地學者以至老師弟子未經發表的二十篇經濟史文章，藉敬先師。前述王業鍵學長的「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一文，亦收入此文集。除了論文，此文集亦有何漢威整編的「全漢昇先生事略」及「全漢昇先生著作目錄」、張偉保的「全漢昇先生年表」及楊永漢親撰「杖履追隨——憶全師漢昇院士」。

不過，最難得的，是文集內轉載了老師親撰而刊於一九九八年中央研究院《古今論衡》的「回首來時路」。老師在文內親自憶述，自民國二十四年大學畢業及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後，如何開展他的經濟史研究道路。此文連同前述的「年表」、「事略」及「著作目錄」，均有助瞭解老師其人其學。



此外，廖學長徵得學林名宿許倬雲俯允，轉載他那篇為慶祝全老師九十大壽而寫就的「門外漢讀全先生的研究」，並作為文集的代序，藉添文趣。此刻手執這本文集，對於廖學長當年辛勞編書，實表感激。可惜筆者整輯本文時，驚悉廖學長月前不幸辭世；當年與學長同窗之情，此刻盡涌心頭。

## 研究成果 廣惠學林

此外，當年在港深承老師教澤的，是學長宋敘五，而他的「重讀全師〈中古自然經濟〉敬作補充」一文，亦轉載於前述廖學長所編的《邦計貨殖》論文集內。宋學長惜於一六年故世。楊永漢等學者特意廣徵鴻文，編成《經濟史家宋敘五教授紀念論文集》，以表崇敬。

老師雖於二十一世紀初以九十高齡辭世，但他所存留的研究成果，仍然廣惠學林，而深得薪傳的一眾學子，對經濟史學續有貢獻。

再次感謝老師當年的冷冷一眼，促使筆者敬誠史學。

（「新亞」學者系列之三）

廣博精深 嚴肅凝練

## 嚴耕望史學卓然大成

記得月前在本欄記載業師全漢昇時，提及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新亞研究所是著名學者薈萃之地。單就史學而言，除前文所述的全漢昇之外，還有孫國棟、牟潤孫、羅夢冊、嚴耕望等人，以及不時從台灣回港訓誨後學的錢穆，而這個強大的史家陣容，敢稱睥睨學林。

這幾位各領風騷、卓然成家的歷史學者，在筆者心中留下迥然有異的回憶。錢穆溫煦儒雅，即便沉默不語，亦教人崇敬幾分；牟潤孫平易近人，從沒架子；羅夢冊不愛說話而總帶着點點斯人獨憔悴之感；孫國棟瀟灑方正，有君子之風；嚴耕望則嚴肅凝練，我輩後學，每每見之生畏。

## 與錢穆師生關係親厚

嚴老師早年修業於武漢大學歷史系，後轉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其後獲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之銜，並歷任多所大學或研究院教職，包括美國「哈佛」及「耶魯」、台灣「東吳」、香港「新亞」及「中大」。

當年「新亞」的規模，細小得斷非現今研究生所能想像。今天研究所上課，學生人數動輒幾十，多則過百；而人多的壞處，是師生之間難有深交。學生與校務處的關係，談不上親切溫厚。回想當年「新亞」，恆常進出校園的學生，每天頂多只有十幾二十人。整

個教務所，只有三職。教務長一職之外，有總幹事一職，而此職是由本所早前的畢業生趙潛先生擔任，另有一位老先生任職書記，負責日常文書，以及操作一台現今已經停用的中文打字機。

八十年代初，電子科技未興。記得那個年代，電腦在港極不普遍；當時美國所使用的電腦，是一台台把電腦室塞得滿滿的大機器，而所謂電腦卡，是一張大大的打孔卡。礙於電子科技尚待開發，我們這輩學子，如果要掌握教務資訊，只得回校詢問，蓋因除非是重要事務，否則一般不會油印通告，然後寄遞學生家裏。這種環境促使學生常回學校，即使當天沒課，只要有空，就會跑回農圃道，流連於教務處，探取資訊。

前述趙潛先生只要沒有因事外出，總會留在教務處。他固然是大師哥輩，可我們作為晚輩後學，斷不敢僭越無禮，直稱他「師兄」，而專稱他「趙先生」。不過，我們這撥調皮鬼，總要在背後喊他「總管爺」，或「趙總管」。他就是我們與所方溝通的最佳橋樑，一切教務信息及所內庶務，全由他傳達。例如，指派筆者擔任「祭唐師」（前往沙田某淨苑拜祭唐君毅老師）的贊禮等任務，全由他決定。簡言之，大家關係密切。

### 在所偶得嚴老師啟導

由於我們長時間蹲在教務處，嚴老師下課後經過教務處時，總會停下步來，與我們閒聊幾句，又或偶然興起，垂詢我輩的學習情況，並時加訓勉，振聾啟聵。例如，記得有一次，他對我們說，做學問工夫，必須先打好基礎，先求博，後求深。又例如，有一次他鄭重提醒我輩，不要信靠單一來源的資料，更切勿憑空立論，然後才往資料裏找有利於自己的證據。這種做法，十分危險。

除了教誨，只要你誠懇求問，他定必回答。如果你看罷他的論著，甚至非他撰寫的論著而存有任何疑問，想叩門請益，他絕對樂意提點。

嚴格來說，筆者在所期間，沒有正式上過老師的課，但從閒來的指導，以至長期拜讀他的論著，也算是幸蒙教澤。

老師早於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修習期間，得遇名師錢穆，旋即成為錢穆愛徒，此後事師親厚。他敬師尊師之情，史學界無人不知。論輩分，他雖然是錢穆的弟子輩，但由於他勤修苦學，因此著作等身，學術成就非凡，卓然成家。

### 著作等身 廣澤後輩

關於老師已予刊行而可傳後世的史學論著，大抵可以分成三大範疇。其一是制度史；其二是地理交通史；其三是治史方法論。

制度史方面，老師著有：

- （一）《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
- （二）《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此書合共兩冊，上冊專論魏晉南朝地方行政制度，下冊專論北朝地方行政制度；
- （三）《兩漢太守刺史表》；
- （四）《唐僕尚丞郎表》（分上下兩冊印行）。

從上可見，老師的制度史論著，既有綜論各朝地方行政制度，亦有專研漢唐兩大朝代的重要官職。

關於歷代地方行政史，據老師親述，他的本意是從秦漢一直寫下去，所以他把這套書名定為《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然後分部撰寫刊行。可惜個人精力畢竟有限，他只寫到六朝便不得不擱筆，餘下各朝，惟待有緣人續此使命。

其實，由他親撰的秦朝至六朝地方行政制度史，已為史學界立下大功，為學術界奠定楷模。須知上述兩部三冊的巨著，已長達一千三百多頁。

### 用功於地方行政制度史

大家可能奇怪，老師以個人有限精力研究行政制度史，何不主攻中央行政制度，而偏用功於地方行政制度？

關於這個問題，他早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的序言闡明。他有感於前輩史家慣於主治中央行政制度而忽略地方行政制度，於是奮發為文，專研地方，蓋因他認為地方制度與民生關係以至對社會禍福的影響，比中央更為直接重大。

此番言論，絲毫不差。回望最近幾十年，治行政或政治制度史者，固不乏人，但不是失於粗略，就是只論中央而鮮涉地方。賢如楊樹藩和張金鑑，亦復如是。

再者，自嚴老師之後，再無良才續貂，為唐宋明清地方行政史補遺，而此乃史學界另一憾事。只恐當今學林，難以覓得一位兼具史才史識的學者，甘於立下宏願、敢於耗費心力，下此水磨工夫。

老師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明言，鑑於「前期史志政書所載殊略」，於是「必賴博求」，因此必須在「正史、政書及地理書之外，子、集、金石、簡牘、類書、雜著等，諸凡當世或稍後有關之材料

無不旁搜掇拾，取供考訂。」由此可見，他在資料蒐集方面力求徹底，不囿一隅。他力求完備無缺的治學態度，足為後學典範。

### 心思縝密 鋪排有序

老師在鋪排此書時極具心思，而且次序分明。他首先探究秦漢郡縣制度淵源；隨而綜論統治政策與行政區劃；繼而先論郡府組織及相關官職和特種官署；再論郡府之下的縣廷組織，以至鄉官及郡縣學官；接着講述地方的監察制度以及官員的任遷途徑；甚至另章專述籍貫限制以及關於官員的任用雜錄。結論之後還加插「漢代地方行政組織系統圖」。以當時未有電腦制圖之法而言，此舉實在費勁。

此書的結構和鋪排，可說是有志治理地方行政制度史者的典範，殊足廣納。可惜，又是老話一句，學界根本無人有力可予補遺。

至於《魏晉南朝地方行政制度》一書，體裁大抵承前，亦是先談行政區劃，下分州郡縣及都督區，繼而專論都督與刺史、州府僚佐等職，然後郡府組織、縣府組織，最後三章則分述察舉及學官、任用雜考，以及官佐品班表。

《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體裁，亦是承前，只不過因應北朝情況，酌增「黨里鄰三長」、「北魏軍鎮」、「魏末北齊地方行臺」、「諸部護軍」、「領民酋長」等專章。

### 「病中消遣之作」

《兩漢太守刺史表》及《唐僕尚丞郎表》兩書，表面看來，只是二手資料的職官表，並非什麼考據或獨具創見之作。豈不知，這



種從原有史籍採擷而得的資料，經過編整表列後，就成為很有輔助功能的資料，方便有志研究當時行政制度的學者參考。

據老師親述，他四十年代在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修讀期間，一邊養病，一邊把先前集得的相關資料編成《兩漢太守刺史表》。他雖謙稱是「病中消遣之作」，但此作面世後確得當時史學界認可，並且成為日後學者研究漢史時的漢朝人物統計表。

在這個成功基礎上，他繼續鉤沉稽異，採擷唐朝史料，整編而成《唐僕尚丞郎表》一書。此書詳列唐代六部尚書、左右僕射、左右丞、侍郎，並兼列度支鹽運使，並就上述諸職予以輯考。當中的編整成果足可比擬前作《兩漢太守刺史表》，甚或過之。

## 強調地理有助研史

老師的另一偉大成就，是地理交通研究。在這方面，他留給後學的，主要有：

- (一) 《唐代交通圖考》，共十卷，並備多個專題附錄；
- (二) 《魏晉南北朝佛教地理稿》；
- (三) 《隋唐通濟渠考》。

綜觀上述三書，不是研究某代交通，就是專論某朝宗教地理，甚至專論某條運河，乍看來，學術意義似乎不大。豈不知，此乃史學界極為珍視之研究成果，蓋因可以從中得到關乎國家民生的啟示。

為此，老師在《唐代交通圖考》的序言首段，便明言交通史何其重要：「交通為空間發展之首要條件，蓋無論政令推行、政情溝通、軍事進退、經濟開發、物資流通，與夫文化宗教之傳播，民族感情之融和，國際關係之親睦，皆受交通暢阻之影響，故交通發展為一

切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之基礎、交通建設亦居諸般建設之首位。中國疆域遼闊，交通建設尤為要務……」

今天我們視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為發展某國某地之要務，而此說堪堪是老師在上述序言所揭示者。

## 歷史地理是為學座標

另一方面，學史之人，必須暢曉地理，能夠熟習交通者，則屬更佳，蓋因脫離了地理，歷史學子根本難掌史料，而每地之山川河嶽、漁農特產、風土人情，皆為治史之核心資料。設若某人有志學史而不諳地理，只恐無論用功多深，亦屬徒勞。

推而廣之，但凡為學，而姑勿論學科為何，亦須講求史地兼擅。歷史與地理其實就是我們積累學識的十字座標。歷史是縱向，地理是橫向。我們每天所見所聞，所學所習，只要以此史地座標領受收集，倍覺易得，益見牢固。

試想，世界萬物千態，有哪一個知識點不是關乎歷史與地理？如果我們打從小孩時代就習慣以史地座標學習，相信學習歷程定必更為快捷暢達。順帶一提，筆者自少年時代就身體力行，更以此史地座標推動小兒學習，為他奠立進德修業的基礎。

回頭續說《唐代交通圖考》。此書所涉浩繁。單以第一卷「京都關內區」為例，他先綜談兩京館驛（按：兩京是指當時長安和洛陽），然後分篇專述長安、洛陽以及附近地區的驛道。尤難得者，是他屢以插圖作為輔助，方便讀者了然。

以他執筆寫書的年代，苦無電腦支援，要弄一圖表，已經殊不容易，何況是幾十幅插圖？老師的苦功，豈是今輩所謂歷史學者可冀及？

## 治史法則 詳加列述

老師在治史方面不單考據有力，論述精闢，更於後期總結了幾十年來的治史心得及諸般法則，寫成小書，供諸同寅，傳予後學。這種無私的分享，當然普澤我輩。

他先寫就《治史經驗談》（臺灣商務，一九八一），然後整合尚餘課題，再編成《治史答問》（臺灣商務，一九八五），而據老師自稱，後者可算是前者的續集。

這兩書內所臚列的條目，可謂條條精準，句句珠璣。例如他提醒我們既要專精，亦要博通；要看書，不要只抱個題目去翻材料；不要忽略反面證據；少說否定話；轉引史料必須檢查原書；研究歷史不要從哲學入手；治史要「無孔不入」、「有縫必彌」……他所言者，怎不是今天學子的當頭棒喝？

## 小題大做 大題大做 大題小做

他在《治史經驗談》第三章倡議，治史者「青年時代應做小問題，但要小題大做；中年時代，要做大問題，並且要大題大做；老年時代，應做大問題，但不得已可大題小做。」（頁七十八）

他這番話，自有其理。年輕時，精力充沛，但學力未逮，為免犯大錯，適宜找些小題目，然後全力大做特做，從而磨練研究技巧。

中年時代，見識日廣，學力漸增，就好應找些大題目，然後大做特做，從事大規模而深入的研究。

到了晚年，精力漸衰，只適宜找些大題目，量力而作，「只能小規模的做工作，寫札記式的論文，最為切當……最為輕鬆……

把一生數十年中對於各種問題的想法寫出來，留待將來研究者作參考……薪火相傳，成功不必在己！」（頁七十九至八十）

## 「成功不必在己」 足見大師胸襟

好一句「成功不必在己」，正正反映這位史家的定位，堪堪展現這位學者的胸襟！人生於世，為他人種下根苗，為後輩開闢路徑，不也是美事一樁？

老師更在《治史答問》第拾柒章「史學二陳」及第拾捌章「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以敬誠客觀態度，評論他的前輩陳寅恪、陳垣、呂思勉這三位史家為學治史的方法、經歷、成就，以及後輩應予學效的地方。

他在「史學二陳」一文指出，陳寅恪治學，不論是早期的佛學和邊疆外族史，中期的中古史，特別是兩晉南北朝史至隋唐史，或晚年寄寓深遠的所謂「心史」，例如《柳如是別傳》，均以考證解決問題，而陳寅恪的考證，側重於辯證，而不是述證。換言之，他「重在運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辯析，以達成自己所透視所理解的新結論。」老師因此推許，陳寅恪「往往分析入微，證成新解，故其文勝處往往光輝燦然，令人嘆不可及」，而且他「此種論文較深刻，亦較難寫。」（頁八十至八十六）

然而，另一方面，在老師看來，陳寅恪「往往不免有過分強調別解之病」，即是說，有時愛走偏鋒，而期收創新之功。有鑑於此，他叮囑後學，對於陳寅恪，「只當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學。」（頁八十六）

## 對陳寅恪晚年的治學 既欽佩又痛心

對於陳寅恪晚年的治學及論著，老師感慨萬千，既欽佩讚嘆，又惋惜痛心。他對陳寅恪，首先稱譽有加，「先生曠世奇才，……語文工具特強，東西學術基礎亦特別深厚，……」隨而感慨嘆息，「近年讀先生晚年巨著《柳如是別傳》，另有一番感觸。先生晚年感切時艱與自己估計錯誤之不幸，奮筆為此巨著，以抒憤激之情。我讀此書，除了對於先生在惡劣政治環境下困頓憤懣的心情深表哀悼之外，對於先生之奇才博學與強毅精神又有進一層的認識，與進一層的欽仰，但同時又更加感到極其可惜！」（頁八十一）

老師進而哀驚，「先生晚年失明……卻在助手誦讀的協助下，完成如此大規模的繁瑣考證論著，其精細邃密較之前此諸論著有過之無不及，……不能不令人嘆為奇迹，絕非任何並世學人所能做得到！而這種奇迹的表現，可以說是憑其曠世奇才與無比的強毅不屈的精神，因特別環境的激發而產生的……發奮為此巨著，以寄憫生悲死之情，事固可哀，亦極可驚！」（頁八十一至八十二）

他隨而質疑，「但……既發憤著書，何不上師史公轉悲憤為力量，選取一個重大題目，一抒長才，既瀉激憤之情，亦大有益於人群百世；……」（頁八十二）他甚至對於陳寅恪晚年撰詩自況「著述唯剩頌紅妝」以至自嘲「燃脂功狀可封侯」之舉，既感悲酸，亦覺惋惜，因而寫下七字痛心語——「真令人悲之惜之」。

### 《柳如是別傳》兩大弊處

老師說完「真令人悲之惜之」，隨即轉評《柳如是別傳》：「此書雖極見才學，但影響作用可能不會太大。」他繼而指出這本《別傳》的兩大弊處，也或可說兩大致命之處。其一，「文字太繁瑣……

應當採取以簡馭繁的方法來處理那些繁瑣考證，……讓一般讀者易於領會。」其二，「這部書……論題太小，又非關鍵性人物……我很惋惜先生這部大書除了表彰柳如是一人之外，除了發泄一己激憤之外，實無多大意義。」（頁八十一至八十二）

他對陳寅恪晚年的嘔心巨著《柳如是別傳》的評論，我們忝為後學，實感確切中肯。然而，豈不知陳寅恪以博獅之力，博細小之兔，原來外情可憫，內情堪悲。

悲嘆過後，從另一角度看，《柳如是別傳》對後學的最大貢獻，是陳寅恪為我們示範了怎樣才算考證仔細，治學嚴謹。

談完陳寅恪，老師在文章後半部轉談陳垣。他首先提述，陳垣自一九一七年發表《元也里可温教考》後至《釋氏疑年錄》的二十年間，「著作涉及多方面：其一，各種宗教史，尤其西方諸宗教傳入中國史。其二，年代學、史蹟學、校勘學、目錄學等，皆為歷史研究所必備的輔助學科，先生諸書多為有創建性的工具書籍。其三，多種著作與元史有關。」（頁八十四）

### 陳垣晚年 無以為繼

老師隨即指出，陳垣上述其一與其二的兩類著作，「都是一般學人所忽略的重要問題，故先生一經做出成績，即為學林所推重。」老師因此稱許陳垣，「這些地方，顯得先生常能適時尋空蹈隙，提出重要有意義的問題，用最大努力，搜集資料，寫成專書或論文，獲取學林的重視。」（頁八十四）

根據老師劃分，陳垣第二期亦即後期著作，應該包括由一九四零年《明季滇黔佛教考》開始，至四五年《通鑿胡注表微》的五部書，而老師認為那五部書「顯示先生學術著作達到最巔峰狀態」。



然而，老師十分可惜，陳垣在四五年推出前述《通鑒胡注表微》時，才不過六十五六歲，在研究及論述方面，應該大有可為，但隨後居然無以為繼。須知陳垣享壽九十二，在最後二十多年停產，老師認為他應該是礙於內地情勢，因此深感惋惜。

## 比較「兩陳」 客觀持平

老師在文末特意客觀比較「兩陳」，「就治學言，兩位先生都是當代歷史考證學巨擘……治學方法，蹊徑大同，差異也很大，但成就都很高。」（頁八十七）

然而，在老師看來，「兩陳」立身處世顯有高下之分。陳垣「自青年時代即熱心世務……唯其與世浮沉的性格，所以晚年不免為政治洪流所覆沒，在學術上不能再有所作為！」反觀，他「深愛寅恪先生純淨學術人的風格，而強毅獨立，不為名利誘，不為威武屈，……自稱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誠非虛語。」（頁八十七）

老師此番經過多年觀察而達至的客觀評論，學林後進，料難反駁。

## 呂思勉國學基礎極深厚

一如前述，老師在《治史答問》第拾捌章以「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為題，與讀者分享他對這位史學前輩的看法。他首先解釋，何以稱對方為通貫的斷代史家：「……先生平生著述極為豐富，……國學基礎極深厚，五十歲以前的著作，屬於國學範疇居多，所以他的史學是建築在國學基礎上。」（頁九十一）

老師繼而強調，呂思勉的治史意趣一點也不保守，並舉出兩大原因說明：「第一，在一九二零年代，一般寫通史都用文言文，而先生第一部史學著作（按：即一九二二年刊行的《白話本國史》）就用白話文，可謂是中國第一部用語體文寫的通史。」除了文字突破，這部通史「內容豐富，而且着眼於社會的變遷，也有很多推翻傳統的意見，這在當時是非常新穎的。……一九三零年代中期我讀中學時，閱讀的人仍很多，也是我讀的第一部通史，相信這部書對於當時歷史教學必有相當大的影響。」（頁九十一）（按：即便今天，遇有後進誠心修讀國史，筆者定必介紹這本《白話本國史》及傅樂成的《中國通史》，堪作初階。）

呂思勉治史意趣並不保守的另一原因：「第二，……他治史相當注意社會經濟方面的發展，在通史及各斷代史中，這方面的篇幅相當多，……這在沒有政治色彩的前輩史家中是比較特別的。」（頁九十一至九十二）

此文下半部提出大家都有興趣知道的課題：以呂思勉的史學修養及成就，應當與錢穆、陳垣、陳寅恪合稱為「前輩四大史學家」，但為何「他在近代史學界的聲光顯然不及二陳及錢先生。」

老師於是根據自己多年觀察與研判，提出三個原因：「第一，近代史學風尚，偏向尖端發展，一方面擴大新領域，一方面追求新境界，……務欲以新材料取勝」，可是呂思勉絕不在此行列，而屬於「博瞻一途」。「第二，近代史學研究，特別重視新史料——包括不常被引用的舊史料。」然而，呂思勉「主要取材於正史，運用其他史料處甚少，更少新的史料。」（頁九十三）

## 埋頭枯守 默默耕耘 不求聞達

老師所提的第三個原因，關乎學術界的現實情況。呂思勉長駐上海光華大學；須知上海不是全國最重要的學術中心，而光華亦非上海最著名大學；北平才是學術中心，是多家名牌大學所在地。「前輩史學家能享大名，聲著海內者，亦莫不設教於北平諸著名大學。誠以聲氣相求，四方具瞻，而學生素質也較高，畢業後散布四方，高據講壇，為之宣揚，此亦諸大師聲名盛播之一因。」（頁九十三至九十四）

可是，呂思勉偏偏是位「埋頭枯守，默默耕耘，不求聞達的學人。」相信這才是人家覺得呂思勉學術修養乃至於聲名地位不及兩陳和錢穆的主因。

呂思勉雖然不是老師的師友，而論資排輩，實屬老師的祖師爺，但老師竟如對方，只管耕耘，不求聞達。舉例說，當年香港「中大」歷史系因牟潤孫老師退休而系內講座教授一職出缺，幾位在港好友鼓勵老師從台來港承乏，而他們甚至樂意舉薦。可是，老師認為講座教授一職的待遇，雖然確比台灣「中研院」優渥而因此可紓當時生活困境，但由於此職須兼行政而勢必窒礙自身研究工作，於是堅拒好意。無論好友如何勸進，亦不為所動，甘於澹薄。

## 老師何嘗不是另一位呂思勉

明乎此，大家就易理解到老師在文章末端解釋，為何對這位素昧平生的前輩大師如此景仰崇敬：「我想像他一定是一位樸質恬淡，循規蹈矩，不揚露才學，不爭取名位的忠厚長者，無才子氣，無道學氣，也無領導社會的使命感，而是一位人生修養極深，冷靜、客觀、謹慎、有責任感的科學工作者。其治史，有理想，有計劃，

又有高度耐性，鍥而不捨的依照計劃，不怕辛苦，不嫌刻板的堅持工作，纔能有這些成就。」（頁九十五）

其實，回望老師一生，他那種不求聞達，澹薄自甘，不嫌刻板的治學精神，何嘗不是另一位呂思勉？何嘗不使人景仰崇敬？

老師在文內最後提到，年來學生前去大專中學教歷史時，常常請教他，應該參考什麼書？他總是回答，「首舉呂思勉的書，蓋其書既周瞻，又踏實，且出處分明，易可檢核。」（頁九十六）

綜觀《治史答問》內「史學二陳」及「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的文章內容，老師對呂思勉的評價，似乎比二陳更高。筆者忝為後學，自愧粗疏，但十分景從老師對上述三位前輩大師的評價。

## 與恩師錢穆關係親厚

至於錢穆與他的親厚師生關係，則另見於《錢穆賓四先生與我》。此書其實是老師兩篇文章的合編，而上篇是「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這篇文章是老師按照錢穆自撰的文章「八十憶雙親」以及《師友雜憶》一書再補以自己所知的資料編寫而成。

不過，此書更重要的，當然是下篇即是他在七十多歲時所寫的「為學從師六十年」。文內由小學跟從馮溶生學習數學因而積極操練此門學問講起。原來他日後能夠以精細入微，不尚虛浮的作風研究諸般課題，都是他自小從數學訓練得來。

不過，文章核心當然在於恩師錢穆與他多年的親厚關係。錢穆曾向他說，做學問能否做出一流成績，不太關乎天資；主要是靠意志毅力，而他的名句是大抵在學術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資，因為聰明人，總無毅力與傻氣。

這篇文章以至全書除了敘述兩師徒如何相處交流，還給了我們有關兩位大師治理學問以至操持品德的側寫。各位閱後，定必感受到那種古有今無的師生關係，根本難望在當今學府復見。

近年坊間慣把前述《治史經驗談》及《治史答問》與《錢穆賓四先生與我》編合為一，並且定名為《治史三書》。當然，三款齊買比較實惠。不過，《錢穆賓四先生與我》的單行本售價也很便宜，目下大概台幣 150 元。

### 《史學論文集》內有杜詩箋證

除上述大大小小的書籍外，上海古籍出版社徵得老師家屬及「中研院」轄下「史語所」同意，在零七年將老師幾十篇長短不一的文章，收錄於一套三冊的《嚴耕望史學論文集》內，而論文觸及的範圍，極為廣闊，既包含政治制度，亦涉及地理，更有諸如人口等人文地理課題。

此外，內地中華書局將老師十九篇文章收錄於一套兩冊的《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內，但所收文章，幾乎悉與前述上海古籍《嚴耕望史學論文集》所收者重疊，只有「杜工部和嚴武軍城早秋詩箋證」一文例外，而此篇箋證在題材上與整套《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內其他文章顯然有別，很值得在此簡介。

「杜工部和嚴武軍城早秋詩箋證」一文，初刊於一九七四年台灣中國文化學院（按：即今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學報》。老師要考證的，是杜甫寫於五十多歲時的一首七絕，題為《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這是一首和應的七言絕詩，而「奉和」一詞，就是奉命和應的意思。

事緣杜甫那位因功獲授鄭國公的好友兼上司嚴武，在廣德二年七月率兵出征時，寫了一首詩《軍城早秋》：「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杜甫身為下屬兼受恩者，於是敬和一詩：「秋風裊裊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

老師在他的箋證末段，說明他寫這篇短文的原委。他有鑑於「此詩似甚易解，亦非佳作；但其實蘊藏甚深，詩的語言藝術亦甚高，一般只從詩句表面作解，殊難悉其底蘊；故特就其寫作之地理背景與歷史背景稍加申述，以明之。」

### 按照史地背景箋證

老師在箋證的初段引載此詩後，劈頭便說：「按此詩表面看來，甚易瞭解，然試問滴博、蓬婆在何處？雲間戍、雪外城何所指？嚴武何以要收滴博雲間戍？已收此戍，何以欲進一步奪取蓬婆雪外城？雲雪是否只是普通名詞，用以壯城戍之高寒？……」於是他按照史地背景箋證此詩。

文內廣引《全唐文》、《通典》、《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通鑑紀事本末》，以至《元和志》、《一統志》、《蜀中廣記》等古史典籍，印證「蓬婆雪外城」是指蓬婆雪山（亦名蓬婆大雪山）外之平戎城（亦即安戎城），而「滴博雲間戍」是指滴博嶺附近的雲山，而杜詩的「雲間」，是借自雲山，實質以地名轉化為普通名詞。嚴武的軍事任務，正正是要恢復松州、維州等地區的控制權，藉此牽制吐蕃，從而減輕長安的西面壓力。因此，嚴武必須因應地理環境，計劃在收復位於維州的「滴博雲間戍」（即前文所指的滴博雲山）之後，進而奪取位於平戎地區的「蓬婆雪外城」



(即前文所指的蓬婆大雪山)之外的平戎城。老師因此指出，杜甫題詩申詠者，其實十分貼合當時的戰略。

老師雖然以此詩箋釋除詩內令人費解的地方，可惜時至今日，坊間注釋此詩時，不是仍存誤解，就是含糊其詞，輕輕帶過，因此必須再予申述，振聾啟聵。此外，老師這篇文章確實彰顯了他的箋證功力，也就是他平常治史的功力。

此番以地名解釋杜詩的箋證工作，老師其後在他的《治史答問》內一篇題為「我對於唐詩史料的利用」的文章，亦有所憶述，並「自信此文(按:指「杜工部和嚴武軍城早秋詩箋證」一文)發千古之覆，想不為過。」(頁三十一)老師此言中肯理切，絕不為過。

### 《嚴耕望先生編年事輯》值得翻閱

順帶一提，上海古籍出版社十多年前將本文所述的巨著十款，據先前的台灣版本重新刊行，廣惠內地學子，而此舉當然功德不淺。自此內地學子可以自由無拘，閱讀老師的各式著作，甚至研究他的史論。

也因如此，內地後進林磊仰蒙台灣「中研院」轄下「史語所」及香港李啓文學長協助，根據老師著作、書信、文稿，編成《嚴耕望先生編年事輯》(中華書局，二零一五)。這本猶如年譜的事輯，內容翔實，報道切正，未見偏頗，可算是瞭解老師其人其學的門徑之一，值得翻閱。

另一方面，二零一三年八月，官德祥學弟在香港「北學南移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以「我印象中的嚴耕望教授」為題，敘述他親領教澤的點點滴滴，並側寫老師治學精神及待人態度；當中特別憶

述老師撰寫《唐代交通圖考》時如何一人獨力成書的艱苦經歷，並以此勉勵後輩。此講稿已收入隨後彙集成書的《北學南移——港台文史哲淵源》(台北秀威資訊，二零一五)。這篇講稿，情真意切，侍教心迹，悠悠道出，確實值得一並閱讀。

### 強毅謹思 任運適性

老師雖於一九九六年十月因積勞過度而病逝台北，尚幸教學大半生，廣蔭後輩，桃李滿門，早如王壽南(後來成為台灣著名史學家，尤專唐史，著有《唐代的宦官》等書)，近如前述李啓文及官德祥等，盡皆遍澤港台學林，實感欣慰。啓文學長更以下述輓辭悼念先師：

秦郎漢守開前路，  
魏鎮唐承綴後篇。  
體大思精傳地理，  
經時緯域寫人文。

此刻，很想引述老師在《唐代交通圖考》的序言所說，藉勉後輩：「當代前輩學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筆端。余撰此書，只為讀史治史者提供一磚一瓦之用，『今之學者為人』，不別寓任何心聲意識。如謂有『我』，不過強毅謹思之敬業精神與任運適性不假外求之生活情懷而已！」簡簡幾句，敘明老師治學精神及生活情懷，效如醍醐，啖之若醴。

拙文短短，失於疏漏，實難詳述老師其人其學，更難以暢論其論著；惟望此文聊作簡介，鼓勵新進鑑領前輩所留珍寶，亦誠以此文對老師的史學貢獻，深表崇敬。

(「新亞」學者系列之四)

# 哲學大儒牟宗三 隨地吐痰視等閒

之前在本欄憶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新亞研究所學生上課情況時，曾提及每科上課人數不多，一般只有幾名，不像現在動輒上百。例如，王韶生的韓柳文，只有學生兩名；汪經昌的戲曲，只有七、八名；徐復觀臨離世前在美孚寓所授課時，也只有五、六名。不過，諸位老師中，有兩位確屬例外。其一是錢穆，其二是牟宗三。

錢穆當時雖然長居台北，但由於心懸「新亞」，因此不時回港，返到「新亞」校園，與一眾學子會面。他每次登壇論學，總有過百學子趨前領教。當中很多都不是應屆研究生，而是已經畢業的學長，又或是慕名而至的校外朋友。錢穆當時已非「新亞」常任老師，難得不時回來訓勉後輩，各路英賢蜂擁而至的熱鬧場面，當然可以理解。

## 牟師開壇 聽講者眾

至於牟宗三，他是「新亞」的常任老師，每周都有課堂，而聽課人數，按理應與其他常任老師相仿。可是，他每次講課，雖不至於與錢穆看齊，但總有幾十人。

清楚記得，他每次開講之前，別說是課室內坐得滿滿的，即便是門口附近的地方，也站得密密麻麻；隨便點算，總有幾十人，當中固然有報了名修讀課程的應屆學生，也有早已畢業但專誠回校聽講的學長。

此外，也有一大批僧俗弟子，有些固然是牟宗三在外面所收的學生，也有慕名而來的同道人，而穿着袈裟的出家人，倒有不少。

大家可能納罕，為什麼牟宗三有這麼大的招聚能力，而其他老師的學生人數，總在十位以下？據筆者推敲，其他老師固然在學養上各領風騷，但全屬文史科目，而所內只有牟宗三專授哲學。

順帶指出，當時所內確有其他老師講授西洋哲學及思想分析，但前者不屬主流，而後者只是入門課，這兩科與牟宗三每年所開的各個科目，絕對不能相提並論。

再者，其時唐君毅已經離世，所以，如果要聽大師講授哲學，就非聽牟宗三不可。不過，即便唐君毅在世，由於他倆講學範疇不一，而且各擅勝場，唐師牟師總有自己一大撥聽眾。

### 「新亞」大門 來者不拒

另一方面，各位或許覺得奇怪，為什麼「新亞」大門，倒是來者不拒？其實，那個年代，大家絕不強調消費權益，也因此從不計較，只有付費學生才有資格進門聽課。「新亞」大門確實時常打開，你即便不是所內學生，要進來列席旁聽，校工絕對不會擋你去路，講課的老師也從來不理會你是不是外來人。

這也說明，牟宗三的課堂，為什麼總是塞滿了僧俗弟子。大家都靜心聽講，從不嘀咕：為什麼我們付了學費而你們這班沒有付費的外人居然走來沾我們的油水？試想，人來得越多，得蒙教澤的人就越多，傳承的功效就越大。這才是教育的最大意義。

但凡學生，總愛在老師背後給他們起「花名」。我們那一代的「新亞」學生，當然毫不例外。在老師跟前，我們當然畢恭畢敬，尊稱一聲「老師」，可是同學之間在背後談論老師時，總有別稱。

例如，我們談論唐君毅，就稱他「老唐」；談論牟宗三時，就喊他「老牟」。可是，說來奇怪，印象中，我們從來沒有把錢穆喊作「老錢」，也沒有把汪經昌、徐復觀、王韶生喊作老汪、老徐、老王。

其實，背後喊牟宗三作「老牟」，絕對是尊稱，絕無半點不敬之意。「老牟」與「老謀」一詞同音，因此語帶雙關。這裏的老謀深算，是心存褒義，稱頌他是哲學大師，深具思考謀算能力。

### 面露英氣 雙目有神

牟宗三個子不高，貌非英俊，但面目清癯，頗有英氣，而且雙眼有神。他愛穿成套的唐裝衫褲，又或一襲長衫；選色方面，不是白色，就是淺灰色或深色，再配上一雙黑布鞋，很有民初的感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笑容。他縱論經緯時，總是語帶笑容。

有很多老師愛在課堂上侃侃而談，甚至講話飛快，巴不得說話的速度追得上自己的思辨速度；牟宗三卻大不相同。他講話總是不徐不疾，甚至慢條斯理，偶爾沉吟半晌，然後才繼續講話。他與很多老師一樣，愛在課堂抽煙，彷彿嘴巴含着煙嘴，說話的靈感才飄然而至。那個年代，老師在課堂抽煙，根本司空見慣，絕無不妥之感。

### 隨地吐痰 若無其事

如果說到有什麼不妥之感，那應該是他在課堂上的另一種行為。記得某年他在所內開了一個佛學課程。一如他所開的其他課程，前來聽講的各界人士多得水泄不通。上課時間還沒到，大大的課室早已坐滿了人，遲到者只得擠在門外聽講。

某天老師在課堂中段，當呷過一口茶，抽了一口煙，繼續講解如何「明心見性」，突然見他面向右側，「咯吐」一聲，一把「飛劍」



穩快落地。班上同學似乎視而不見，絕對沒有面面相覷，也沒有聳肩示意。

只見老師若無其事，喉嚨清完，繼續講他的「明心見性」。可是，當時尚算年輕的我，整個愣住了。

雖說八十年代初，香港的公眾衛生意識不高，街上隨地吐痰簡直是等閒之事。不過，此等行為，僅限於販夫走卒；斯文君子，絕對束身自好，多所不齒。牟宗三貴為頂級知識分子，而且為人師表，聲譽昭隆，在課堂上隨地吐痰，怎堪為人表率？

### 貴為大師 竟可不必恪守規矩？

或許有人認為，身為大師，倒不必拘泥小節。然而，我總覺得，你既然是儒家子弟，揭櫫儒學，提倡「人人皆可為聖」，為什麼自己作為儒家中堅分子而不願恪守甚或懶得遵守這麼簡單的規矩？誠如英諺所云，If you don't practise what you preach, why preach? 中國人不是也很強調「正人先正己」嗎？難道你貴為宗師大儒，就認為可以在小節上得到豁免嗎？

牟宗三的行為，實在難以接納，蓋因我堅持，如果你連最低的行為標準也達不到，你的宏大學說，只不過是一大堆空言。

我們當然明白，那個年代，大家口袋裏根本沒有一包包紙巾。想吐痰而手無紙巾，情景確是狼狽。不過，我們大多帶備手帕，急需時可暫作盛痰之用，回家後清洗便可。又或情非得已，痰須吐地，事後也應馬上吩咐同學代報校工，前來抹抹地板，清除痰漬。

總不至痰吐在地而渾覺無事，繼續講學。此事竟然發生在新儒家大師身上，我深感憤慨。

### 強化「外王」 倡行「三統」

撇開此事不談，牟宗三的確是二十世紀哲學大師。以最扼要的說法，他的貢獻在於梳理宋明理學諸位大師的義理，使之上承孔孟，下開現代。

他另一功勞在於幾乎通盤檢視了歷代諸般思想（或可稱之為哲學）問題，並確切指出傳統的「內聖外王」，問題不在於「內聖」，而在於「外王」不夠強大。為此，他建議「三統」並行。

所謂「三統」，是指道統、學統、政統。道統是指以儒家為本的道德價值；學統是指廣納四方包括古希臘精神，強調學術獨立；政統是指肯定民主政體的發展。他贊成發展科學，但對於西方一味重視科技文明，而忽略精神文明，卻大不為然。

牟宗三更連同唐君毅、徐復觀等有心人，在不同的範疇一起弘揚儒家精神，以儒家作為建國匡民的根本，也即是現代人所說的核心價值。他們一致認為，復興儒家，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策。

在牟宗三看來，孔子所提倡的儒家精神，本質上是一種「常道」，一種恆常而正常的生命之道，而歷代所有典籍，都是儒家精神的外在表現。

### 陸王康德 融為一體

要認識牟宗三的整套學說，或許先從兩處入手。其一是熟讀宋明理學裏陸（九淵）、王（守仁）的「心學」；其二是西方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學說。牟宗三對這位德國哲學家極為心儀，甚至把他的幾本巨大論著譯成中文。他把陸、王之學與康德學說融為一體，供己所用。

不過，他並非生吞活剝。他在認同康德的當兒，拒絕了對方有關「物自身」的看法，而看作是一種倫理與道德的實體。

牟宗三終其一生，演講不斷，論著無間，若要一一鉤沉，斷非這篇短文所能，更非個人學養所逮，只可在本欄粗略介紹他幾十年來所刊行的大大小小論著。

### 論著豐富 範疇廣闊

牟宗三著作等身，已予刊行而光是筆者手執者，就超過二十冊。為方便簡介，我們可以大概分之為幾大類。

其一，專論中國哲學而按縱向列舉的，計有：

(1) 《歷史哲學》，由夏商周「平等與主體自由之三態」兼提及「黑格爾論東方」，至「東漢二百年：理性之內在表現時期」；

(2) 《才性與玄理》，從「王充之性命論」至阮籍的樂論，嵇康的名理和裴頠的崇有論、一套三冊的《心體與性體》，書內暢論宋明儒學周、張等六子的諸般課題，並且由「正名：宋明儒學之定位」講起；

(3) 至於《從陸象山到劉蕺山》一書，可視之為前述一套三冊的《心體與性體》的延續，詳論陸象山的「心即理」，陸朱之爭，王龍溪的致知義辯，以及劉蕺山的慎獨之學；

其二，專論佛家的著作，計有：

(1) 《佛性與般若》，一般以上下兩冊印行。此書可以說是牟宗三離開儒家軌跡而另論南北朝至隋唐的佛家發展，從《大智度論》談到天台宗的義理和典籍；

(2) 另有《圓善論》，此書從天台宗的圓教談到康德的圓善問題，而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書內末章刻意將道家之圓教與圓善以及儒家之圓教與圓善，與佛家之圓教與圓善並列齊觀。牟宗三的目的，明顯是要凸顯儒家最有成效。因此，他在書末寫下四句頌言：

「中西有聖哲，人極賴以立。

圓教種種說，尼父得其實。」

他寫了四句頌言，還似覺不足，於是進而歌詠：

「儒聖冥寂存天常，孟軻重開日月光。

周張明道皆弗違，朱子伊川反渺茫。

象山讀孟而自得，陽明新規亦通方。

四有四無方圓備，圓教有待龍溪揚。

一本同體是真圓，明道五峰不尋常。

德福一致渾圓事，何勞上帝作主張？

我今重宣最高善，稽首仲尼留憲章。」

其三，是以西方哲學家康德為本的《現象與物自身》。成書的緣起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他為主講知識論而將自己多年「所學知者」，經消化後而得到綜述（「系統的陳述」），乃發為文章，從康德所指的現象與物自身的分別，一直談到執相與無執相的對照；

其四，從儒家看諸般問題的論著，當中計有：

(1) 《政道與治道》，書內從討論封建貴族政治與君主專制政治，到闡釋儒家的德化治道、道家的道化治道、法家的物化治道，一直講到道德判斷與歷史判斷；

(2) 至於《道德的理想主義》，按照作者自己的說法，可與前述的《歷史哲學》和《政道與治道》合為一組，內載有關儒家學術、道德的理想主義、人文主義等課題的文章；

其五，從演講或課堂輯錄而編成篇幅較小的綜論，計有：

(1) 《中國哲學的特質》——六十年代應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邀請，就其指定題目演講。而題目全部關乎儒家思想；合共十二講；每講一小時；由學生王煜筆錄；

(2) 《中國哲學十九講》——一九七八年向「台大」哲學研究生綜述中國各朝哲學；經弟子胡以嫻等整理錄音，然後輯成講章；

(3) 《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據老師自述，這是繼《十九講》的續講；其後由弟子林清臣筆錄整理。當中既有分論中、西哲學，亦有并論，也有幾篇專論康德；

(4) 《周易哲學演講錄》——七十年代老師在「新亞」開授《周易》的課堂講章；前半共二十一講，專講《周易》；後半共九章，專講《繫辭傳》；

(5) 《名家與荀子》——收錄了五十至六十年代就荀子、公孫龍子及惠施而先後發表的文章；

(6) 《人文講習錄》——自一九五四年起，老師在台北成立的「人文友會」下連續兩年舉辦了五十多次聚會；每次講題不一，但範圍總是關乎人文學科，與會者前後累計百多人；其時常有參與而後來成為名家的學者包括勞思光、蔡仁厚、韋政通；

(7) 《中國文化的省察》——八十年代初應《台灣聯合報》邀請，先後就中國文化不同課題演講。全書共收五個講題，而當中的「文化建設的道路」，則分上、下兩篇載錄。

### 講章雖短 但極可觀

上列演講集錄，範圍廣闊，議題繁多，很難在這篇拙文大幅綜

論。只想在此指出，這七款書所載錄的講章雖然較短，但可觀之處極多。在此酌選兩篇，聊予簡介。

《中國文化的省察》（台灣聯合報叢書，一九八三）內載一篇屬於八二年的講章，題為「漢宋知識分子之規格與現代知識分子立身處世之道」。他選這個講題，其實主要是回應梁漱溟早前評論毛澤東的一篇文章。他刻意論述東漢末年及北宋這兩個不同朝代文人以至現代文人的規格，藉此批評梁漱溟身為知識分子的言行。

他首先在演講中「申報利益」，明言梁漱溟作為前輩，確實有恩於他。事緣梁與牟的老師熊十力份屬知交，而且抗戰時期梁在「陪都」重慶開辦了勉仁書院，其間曾聘請熊擔任教職，並給予住宿，而牟當時正在投靠熊。換言之，梁確實在那段艱難日子有恩於牟。如果按照傳統禮教，梁既是長輩，又是恩人，牟委實不應「目無尊長」，「忘恩負義」，日後反過來抨擊梁。然而，牟認為梁儘管有恩於他，但在正義事理的大前提下，不可避而不評。由是觀之，這是私恩與公義的矛盾之爭。

### 評梁漱溟 想當教主

他評論「梁先生……也想作之君作之師，只是沒有君位而已。」這裏所說的「作之君」及「作之師」，是指梁儘管並無君位，卻想仿效當權者，作人民的君，作人民的師，祈求「君」、「師」合一。

牟師繼而引述一則實例，說明梁心存僭越，不願恪守「士」的本分而偏偏愛當教主。

話說某年，熊十力得知牟宗三擬返家鄉山東一行，於是囑咐牟順道前往鄒平拜訪梁漱溟，並且參觀梁在該地的鄉村建設。牟遵師命，既訪梁亦觀其建設。觀畢，梁問牟有何意見，牟直言：「梁先



生想以鄉村建設的方式解決中國政治問題，似乎不夠，做不到。」梁很詫異，說道：「你怎麼說不夠呢？你表面看的，不能代表我心中的理想。」牟則回應：「鄉村建設是你的事業，你以為代表你，才要我去參觀的，既然不能代表你，什麼能代表你呢？旁人無法作判斷。」這番回應，惹來梁一輪責備，罵牟不夠虛心。他倆那次見面，當然不歡而散。

## 鄉村建設 概念空泛

牟師在隨後的演講中批評梁的鄉村建設只是空泛概念，並未確切。他只是想把鄉村建設造成一個救國運動，而當很多年青人問他，參與這項運動，要具備什麼教育程度，他回答：「不要什麼程度，初中程度就可以，知識越多越壞。」

牟於是抨擊梁，他不要求參與的年青人有什麼高等才學，是因為他希望年青人都得聽他那一套，而那一套是什麼呢？牟直指，梁那一套就是要恢復自明太祖就開始傳下來的「說聖諭」。所謂「說聖諭」，就是在農閒時把農民聚集起來，由讀書人向他們講述「孝、弟、慈」的道理，期以移風易俗。梁的那一套，就是推行新一代的「說聖諭」。

牟於是狠批梁以「說聖諭」來搞鄉村建設。為存神髓，茲將當時演辭抄載如下：

「鄉下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忙得很，每天回到家裡還得聽教訓，煩不煩。再說能教訓他們什麼？建設些什麼？關於農民的知識梁先生實不如一個農民。孔子說『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不如農民，還要教訓農民，結果只是騷擾農民。」

農、工、商的工作都有其特別的內涵與知識。『士』，知識分子，對這些工作一竅不通，還要來教訓人，做教主，行嗎？鄉村中所要求

的建設是農業現代化，增加生產，使農民脫於貧困的狀態，這是需要人力、財力和專家知識的，梁先生那有這些？

沒有這些東西，『教主』有什麼用？

從前『士』為四民之首，為人尊重，是因為士能讀書做官，扶持教化，立人道之尊。不是要你到鄉下當教主。

就教主來說，梁先生那個教主並無多大的效果。梁先生為人極有性情，也有思考力，但就在想以到鄉下做『教主』的方式來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這一點上，遂使他的生命走不上正當的途徑。他接不上儒家內聖外王的弘規，他並把握不住中國歷史文化的大動脈。他對於國家現代化完全不能有所了解，對於首先發自西方的自由民主那套完全不能欣賞。他亦不了解馬克斯主義……他的生命在這個時代並未得到順適調暢的發展。他因著時代的歪曲……自己亦形成一個扭曲的型態。其主要癥結是在知識不夠。」（頁六十八）

## 狠批尊長 不留情面

從上述講話可見，牟師把梁漱溟狠批至體無完膚。他不但罵對方不安於位，有士不做，竟然跑去農村搞文化建設而實質想滿足一己的教主欲望，更罵他不夠格，達不到內聖外王的儒家宏規。他甚至掌握不到他所處年代的動脈，而最要命的，是抨擊對方的失敗，是歸結於他知識不夠。罵知識分子知識不夠，根本是最大的羞辱。由此可見，牟師對於這位尊長，半分情面也不留。

牟師也真是的，他明放着是藉着「漢宋知識分子之規格與現時代知識分子立身處世之道」這個講題，而發表他對梁漱溟這位前輩的惡評。細究其實，是牟師絕不認同梁漱溟失態，失卻讀書人應有的氣節而甘於獻媚，明明受着當權者逼害，反而嘉言歌頌。

## 重新演述 「內聖外王」

另一方面，《人文講習錄》內載有「通向新外王的道路」（一）（二）（三）篇，是牟師以新外王為題，一連發表三次講話。

首先，他指出，以往講「內聖外王」，是指「外王」乃由「內聖」推衍出來。儒家的「正心」、「誠意」是內聖，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外王」。不過，時至今日，這種說法確實不足夠。他因此定立了一種叫作「新外王」的講法。他清楚指出，「外王」不是由「內聖」直接推出來的，而須經過一重轉折，一種過渡階段，而這種轉折主要靠科學、民主和良知。他因此說明：「科學雖與正心、誠意有關，以之為本，但不能直接推出科學來，王陽明講良知，並不能產生科學。」

牟師特別申明這一種轉折，實在困難。須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即一方面科學和民主與良知有關係，一方面科學和民主又有獨立性。若從做事上講良知，確可使事情做得好些，但對科學民主卻無直接關係。」

## 民主觀念 未進生命

他繼而指出，「五四運動」以來，人們對科學和民主，有兩種不同看法。其一，科學、民主是與中國對立的，因此必須打倒中國文化；其二，科學、民主實為中國所固有。他認為這兩種看法都不正確。中國人其實要把科學、民主與中國文化連接起來。

不過，要連接起來，根本極不容易。而須先「了解這一轉折，即科學、民主與良知有關，但科學、民主有獨立性。我國講科學、民主已有數十年，為什麼還不出來？其實理由很簡單，就民主言，

像憲法、權利、義務、自由、平等、選舉、被選舉等觀念，大家現在都知道為什麼生活上不習慣這一套呢？即這一套觀念尚未進到我們生命裡來。這些名詞，從表面上看很易了解，但欲其進到意識裡面來，在生命生根，這卻很難。」

## 內聖外王 真行得通？

由是觀之，中國人對於民主，只限於頭腦認知，並未真正走進自己的生命裏，以至在生命生根。然而，大家有沒有想過，民主走不進中國人生命，細究其實，是我們太慣於君民模式，以致嚴重仰仗人治，而人治與民主，本質上背道而馳。再者，所謂「內聖外王」，甚至是「新內聖外王」何嘗不是君民模式及人治思想的申衍？牟師所揭櫫的，是否真的行得通？

不過，無論如何，對於這個課題有興趣的文友，倒可翻閱上述三篇講章，從而瞭解牟師由「內聖外王」轉變至「新內聖外王」的思路歷程。

牟宗三的諸般論著，本由台灣幾家大書店印行，內地學子較難索閱；但最近十多年，慶有內地不同書店先後刊行。尤其難得者，是上述書籍，很多都得到牟門弟子如蔡仁厚等或牟學專家如羅義俊等親筆題序或親撰導言，為讀者與作者架起橋樑。

牟宗三論著豐富，範疇廣闊，義理精闢，而且弟子眾多，對中國現代哲學影響殊深。他絕對是二十世紀繼乃師熊十力之後，一位極為重要的哲學家。

（「新亞」學者系列之八）

既是史家 又是神父

## 方豪專治中西交通史

日前在本欄淺談宋史專家鄧廣銘時，提及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我輩就讀高中及預科時所用的宋史參考書，計有：份屬鄧廣銘北京大學師兄黎傑的《宋史》，任教香港大學多年的林天蔚的《宋史試析》（林著《宋代史事質疑》另於八十年代在台灣刊行），以及方豪的《宋史》。

單以方豪而言，他一生著作極多，既有文史論著，亦有宗教綜述。不過，研習歷史的讀者定必知曉，他雖然寫過一本《宋史》，但學術界並不視他為宋史專家，而是尊他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翹楚。長期以來，他的《中西交通史》是修習這門歷史的學子必讀之書。不過，既然前文以鄧廣銘治理宋史為題，本文何不先簡介方豪的《宋史》，然後才進入正題，分享他的《中西交通史》。

此刻手執方豪的《宋史》，屬於一九七六年第五版，是由台灣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發行，並由當時的台北中國文化學院（今已升格為中國文化大學）屬下華岡出版部印行。此書有兩個版本：其一是分第一及第二冊印行；其二是一、二冊合訂，而我所執者，是合訂本。

其實此書與前述《中西交通史》，都是方豪在一九五三、五四年應時任教育部長亦即其後創辦中國文化學院的張其昀以優厚潤筆金邀請，為教育部所建立的「國學基本知識叢書」所撰寫。

## 《宋史》鋪排 與別不同

就我所知，方豪只寫過這本斷代史，而沒寫過其他朝代的斷代史。不過，他的《宋史》在設計鋪排方面，與別不同。一般的斷代史，慣將全書分成若干篇，而每篇之下設有章、節；先講治亂興衰，繼寫典章制度，再談經濟建設、社會狀況，最後綜論文化學術，而書末載有若干附錄，包括參考書目。

然而，方豪《宋史》的鋪排，可謂別出機杼。他並沒有把全書按上述幾個大綱目分成若干篇，而是分成二十二章。第一章居然是「研究宋史之參考資料」，而關於治亂興衰、典章制度、財政經濟、社會人口、交通城市、文學史學，則散見於各章，並以「地理學」作為全書最後一章。

大家可能奇怪，為什麼方豪把一般史家放在書末的「參考資料」放在首章呢？對此，方豪本人並沒有任何解釋。不過，從首章「研究宋史之參考資料」的論述可以得知，方豪作為史家，十分看重賴以成書的各種史料。他先講述宋代的官方史料，繼而介紹私人著述的官方資料，隨之評論元代如何整理宋代官方史料，最後提及宋代地理書籍所載的史料以及宋代有關歷史的其他著述。

## 不同史料 如何看待

方豪如此載述，除了說明各種史料的來源及作者本人如何看待不同種類的史料，更把當中的史料按其可信及重要程度劃分。例如在此章開首之處言明：「研究任何一代之歷史，當代而又為當時所留之史料，實為最有價值之參考資料，當代而非當時所留，如南宋人而記北宋之事，甚或同為北宋，但宋初太祖、太宗時之事實，其見於英宗、神宗時人之著述者，其價值即較低」。



不過，他亦說明，元代初年的宋朝遺民，如果以第一身憶述當年之事，儘管按時代劃分，是元朝人，但所記述的，都不失為第一流資料。

方豪在書末即第二十二章專論地理學，並說明「宋初討平五代割據各國，即搜索其圖籍」，而所收圖籍，當然包括地圖及地方志略。此外，方豪指出，宋代設有專責管理全國繪圖工作的人員，而朝廷亦規定各州必須作圖。

另一方面，宋代承襲了唐代的做法，繪有中外地圖，即時人所稱的「華夷圖」，而方豪認為這類地圖的編制及嚴禁地圖流出國外的做法，在某程度上反映了宋人的世界觀。

《宋史》末章用作專題記述宋代地理學的發展情況，想必是由於他自己對中西地理交通極有興趣，所以格外重視這個課題。

### 《中西交通史》貢獻很大

如果要論述方豪對史學界的貢獻，上述《宋史》恐非居首；《中西交通史》才是貢獻最大、影響很深的力作。此書在一九五三年台灣初版。余生也晚，無緣買到五三年的初版，只是在七六年購得刊於七四年的第五版。

由於史學界根本極之缺乏中西交通的史書；縱使有，也只是些近乎小冊的小書，方豪的《中西交通史》於是成為這方面唯一的權威論著，因此這套交通史歷年不斷重印。上述初刊於五十年代的版本，是一套五冊的印本；及至一九八三年，此書經重排後分成上下兩冊印行，而我亦購得一套。

由於早前刊行的一套五冊初版，今天學史者未必接觸到，本文

引述此書時，所用版本轉為八十年代的一套兩冊重印本。必須說明，新舊兩版只是版面及冊數有所改動，書內文字並無更易。按新版劃分，上冊除「導言」外，分兩篇記敘「史前至秦漢魏晉南北朝」（共十六章，即舊版第一冊）和「隋唐五代及宋」（共二十二章，即舊版第二冊）；下冊另以兩篇記敘「蒙元及明」（共十七章，即舊版第三冊）和「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共十四章，即舊版第四冊及第五冊），全書連「導言」合共七十章，約一百萬字。

但凡提及「中西交通」一詞，歷代以來難免界線不一，範圍含糊。方豪寫《中西交通史》時，對於「中西」一詞，在其「導言」清楚說明，「本書內容，將包括歷代中國與歐亞大陸之中國迤西部分之關係而言；然在敘述上有必要時，則亦兼及中國與東南亞（越南、緬甸、暹羅）及南洋等處。」換言之，書內除處理中國與歐亞大陸之處，亦稍兼南洋。

### 「交通」實指文化交流

至於「交通」一詞，並不是指從甲地去乙地的路途和工具，而是指兩地關係。此等關係，按方豪界定，包括「民族之遷徙與移殖；血統、語言、習俗之混合；宗教之傳布，神話、寓言之流傳；文字之借用；科學之交流；藝術之影響；著述之翻譯；商貨之交易；生物之移殖；海陸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維繫（使節之往還、條約之締結等）；和平之破壞（糾紛、爭執與大小規模之戰鬥等）」。

依上文所示，範圍極其廣闊，而「交通」一詞，根本難以全然涵蓋。看來此書如果寫成「文化交流史」，則更為貼當。鑑於書內範圍闊大無比，委實無法在此一一縷述，本文只可酌選三幾項，聊作談趣。

書內第一篇第十二章「漢與大秦之關係」提到「大秦」一詞，出現多種甚至矛盾的含意。由《三國志》謂大秦人「似中國人而胡服」及《後漢書》「其人……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至日本學者認為大秦乃指印度及其鄰近之地，包括波斯，以至指大秦為羅馬，又或通指波斯、敘利亞甚至埃及，簡直莫衷一是。我輩修習歷史而每遇此詞時，亦覺含糊難辨。

方豪綜合上述意見後，認為「大秦」一詞，「有廣義狹義，狹義之大秦，或遠或近，所指不一，當按每一文獻，為之考證；廣義之大秦，則為西方即西海之通稱，猶今日所言西洋，所指極廣。」他在書內贊同張星烺所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的說法，認為《後漢書》之大秦，似乎是指羅馬帝國；《三國志》「魏書」之大秦，似乎專指敘利亞。張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的說法，以及方豪所提出的廣狹兩義，我輩學子，覺得比較穩妥。

### 匈奴有功於文化傳播

至於匈奴其族其事，《史記》和《漢書》均已記之甚詳，而現代亦有專書論及。不過，方豪在《中西交通史》第一篇第六章「漢代西域之經略（上）」第三節「匈奴在東西文化交流上之貢獻」，則另有論述，而且值得一讀。他首先指出，匈奴即西史所謂的Huni。至於匈奴究竟屬何種族，他認為從比較語言學斷定，應屬土耳其系。他繼而說明：「匈奴行蹤及於歐亞二洲，其文化之成分以西伯利亞及西徐亞（即 Scythia 或 Scytia）為主，參以中國、希臘及伊蘭諸系，而成為世界性文化。」他根據考古學家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從庫倫附近掘得古墓群而發現的文物，推定是匈奴墓，而墓內文物，兼含中國、波斯及希臘三種。

他繼而說明：「自匈奴活躍之時代及遷徙之路線觀之，匈奴最初之文化，應為純西伯利亞式，其後受秦漢之影響，乃加入中國文化，及西侵月氏，西域諸國皆歸所屬，則又加入西徐亞文化……其後，匈奴裂南北為二，南匈奴徙入中國內地，完全漢化；北匈奴則遷往歐洲，而同化於希臘、羅馬。故匈奴本身無獨特文化，然於東西文化之傳播，則自有其貢獻也。」方豪對匈奴之歷史評價，後學或可再予思考。

### 宋代船舶 規定嚴格

除了類似上述的學術辨釋，書內亦有不少有趣的記載。例如他在第二篇第三章第一節「唐代前後中國海舶之進步」、第二節「唐宋時代，中西海舶之比較」及第三節「中國海舶之組織及其設備」，引述各種典籍，指出遠航商船的深度及闊度，各有數十丈，而每名商人可以分配到數尺的空間貯物，夜則睡於其上。所載貨物，多屬陶器（按：應該是瓷器）。乘客一般不怕海上遇到風浪，反而害怕擱淺。

另一方面，宋代對於海船的形制及人員編制，均有規定。例如船上須有綱首（即船長），船上役屬不聽號令者，船長有權笞打；船舶須持有市舶司所發的「朱記」（即執照），而船長姓名及乘客人數均有敘明。此外，船上備有武器和定額的弓箭手、盾手及專職發射火箭的弩手。

方豪亦引述，當船行大海時，熟悉海事的舟師須日觀太陽，夜觀星宿，陰天則看羅盤；又或以「十丈繩鈎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此外，行舟時遇有乘客患重病，船上切忌有人病死舟中，於是將還未氣絕的病人捲入席中，然後投入大海。

## 《幾何原本》元朝傳入

方豪在第三篇第十一章第二節「希臘幾何學輸入中國溯原」裏指出，很多人只知明朝萬曆年間由利瑪竇口授、徐光啟筆錄之歐幾里得（Euclid）的《幾何原本》，但很少人知道，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歐幾里得的幾何學，其實是第二度的傳入，而第一次的傳入是在元朝至元年間，即十三世紀七十年代，當中記載了兀忽列（即歐幾里得）的算法段數（即 Geometria，幾何學）。

他亦在書內第三篇第十七章「嘉靖間西人在我國沿海之活動」內，提及澳門和 Macao 這一華一洋的名稱。澳門於明朝嘉靖年間，隸屬香山縣，因此稱為香山澳，但其原名是蠓鏡澳，而蠓亦作濠。此外，根據《澳門記略圖》所記，澳門有一「娘媽角」（估計是媽閣廟的媽閣，而「閣」與「角」同音），當中的「媽角」，就是 Macao 的音譯。

## 若干交通史論著 值得翻閱

匆匆列述書內數項議題，只可惜礙於篇幅，無法在此枚舉。為增談趣，我順道介紹一些與中西交通史有關的參考書籍，以供選讀。當然其一是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此書雖然早已絕版，但大型圖書館應該仍然可以找到；其二是方豪也曾在《中西交通史》內引用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這套匯編是由張星烺在一九三零年推出，是他匯集歷代相關史料的成果。以現代印本而言，全書共四冊（初版時分六冊），書末附載馮承鈞閱罷此書而寫的「評《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一文，以及張星烺「答馮承鈞《評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一文，而該兩文可以併讀。張星烺（一八八一至一九五一）是位留學美、德兩國而隨後歷任北京大學及輔仁大學教

授。這套匯編所收資料，包括上古時代（即漢武帝之前）的中外交通，以及漢代至明代中國與歐洲、非洲、阿拉伯、亞美尼亞、猶太、伊蘭（即古代波斯）、中亞及印度的交通，是一套很有閱讀價值的匯編。

此外，史學家向達亦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寫了一部只有四萬字的《中外交通小史》以及只有五萬字左右的《中西交通史》。兩者篇幅雖短，但值得一翻，而這也是我少年時代必讀的書。另一方面，大家如果有興趣閱讀專書，倒可翻閱史學名家陳垣（援庵）寫於三十年代的《元西域人華化考》。書內除緒論外，分儒學、佛老、文學、美術及禮俗五卷，論述西域人在漢化歷程中的諸般成就。書末另設一卷「女學」，專談西域婦女漢化的情況。尤難得者，此書由另一史學名家陳寅恪作序，大家可憑這篇短短的序文，管窺現代史學界「兩陳」（即陳垣與陳寅恪）的關係，甚至可視作史學界的小小美談。至於陳垣與方豪透過函授而建立的師生情誼，則記於本書稍後的陳垣一文，於此不贅。

國人治理中西交通史，每每囿於外文（尤其西域諸國文字）認識有限而難以鑽研，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確可稍補匱乏。

## 著作豐富 惜多絕版

綜觀方豪一生，著作極為豐富。光是曾予刊行的單行本專書，計有三十多款。可惜絕大部分已經絕版，難望再刊。單就目前而言，除前述《中西交通史》及《宋史》，坊間仍可買到的，是《台灣早期史綱》（台灣學生書局，一九九四）以及《紅樓夢西洋名物考》（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二零一七）。



前者是方豪弟子許雪姬等人從乃師遺稿中集得有關台灣歷史的文章，然後輯集成書。事緣七十年代中，方豪有感於居台已有四分之一世紀，為求「入鄉隨俗」（引用弟子許雪姬語），並且再度發展早年曾經從事的「近身之學」（按：即指作者從事與自身四周有關的學問。例如當年身處杭州，因而寫成《浙江天主教小史》），因此銳意撰寫一本完整的台灣史，於是由七六年起不斷寫作。可惜到了七八年九月，因身體欠佳，久臥病榻而續筆無從。

### 弟子把遺稿結集成《台灣早期史綱》

方豪逝世後，一眾弟子從遺稿中集得屬於這個台灣史計劃範疇的文章十一篇，由弟子趙雅書、梁庚堯、古偉瀛、李東華分別校讀，然後交由另外兩位同門即張勝彥與許雪姬詳閱，並加註解，但遺稿的用字及論點，完全保留，不予改動。

由於遺稿的範圍僅限於「台灣的史前時代」（即成書後的第一篇）至「西班牙的佔據北部」（即成書後的第十一篇），而十八世紀後未及論述，一眾弟子把遺稿結集成書時，只好以《台灣早期史綱》作為書名。此書除正文即十一篇文章外，附有弟子許雪姬的「方杰人教授對台灣史研究的貢獻」一文，以及一篇短短的「後記」，並得同門張秀蓉撰文，權作「代序」。

此書初刊於一九九四年亦即方豪逝世後十四年左右。全書共有二百三十多頁，篇幅不短，很難在此逐篇介紹。有鑑於方豪既是交通史專家又是神職人員，我因應他的「老本行」而提出書內分別關乎交通及傳教的兩個課題，稍予介紹。

### 講述明代關乎台澎諸島的航海

方豪在書內第六篇講述「明代中國航海圖籍上所見台澎諸島嶼與針路」。所謂「針路」，是指航海者依循指南針所示的航海路線。方豪在篇內引用明朝航海典籍，例如徐雲林《玉芝堂談薈》、張燮《東西洋考》、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講解一些相信現代讀者也感興趣的課題，例如「針位」、「針盤」、「更」。

指南針固然是我國發明，但至於以指南針用於航海，則始於宋朝。明代萬曆以前，航海者主要用水浮型的指南針，其後由於中國沿海地區常受倭寇滋擾，因此從日本船學得使用旱針羅盤。

「針盤」即方位盤，而方位盤上，是以天干、地支並加上八卦方位配成二十四個方向。先以十二地支平均分列在一個圓周上，以「子」為正北，「午」為正南，彼此分隔一百八十度，形成直線，而各個地支之間，例如「子」與「丑」之間，彼此相隔三十度。天干的「甲」、「乙」與位於九十度的「卯」各有十五度之差。換言之，「甲」位於七十五度；「乙」位於一零五度。天干的「丙」、「丁」，則分別位於一百六十五度及一百九十五度，而兩者之間是位於一百八十度的「午」；天干的「庚」、「辛」則分別位於二百五十五度及二百八十五度，而兩者之間是位於二百七十度的「酉」；天干的「壬」、「癸」，則分別位於三百四十五度及十五度，而兩者之間是位於零度的「子」。天干的「戊」、「己」，則沒有用於羅盤方位。至於八卦的「坎」、「震」、「離」、「兌」，乃分別位於正北、正東、正南、正西，而「艮」、「巽」、「坤」、「乾」，則分別位於東北、東南、西南和西北。

方豪亦在篇內引述《順風相送》及《指南正法》這兩款古籍的計算海行之法，以每「路」或每「站」為六十里。然而，里是怎樣

計算出來的呢？由於船速受風向及水流的順逆緩急影響，舟師為計算每里所需的航行時間，便吩咐水手，在船頭拋下柴片，任其隨水而流，人則由船頭走至船尾，如果人比柴片又或柴片比人先抵船尾，則屬「過更」，而如果兩者同時抵達船尾，則謂之「上更」，而航海者視「上更」為標準航速。

至於船上的計時方法，先後出現新舊兩式。按照舊式，是以一個形如酒壺的瓷器漏筒，放滿細沙，然後懸於空中，而讓細沙從筒眼漏出，並漏入另一磁筒。當上筒漏完而即下筒已滿，則謂之一更。後來漏筒改為玻璃所造，而上下壺亦相連一起。每當上壺漏空而下壺填滿，就是一更。然後可將之倒轉再漏。此舉較為快速簡便，而且沙在玻璃裏，船員可以清楚看到沙漏的整個過程而方便計算。

此外，方豪在本篇第二章的「附文」表示，鄭和除了七下西洋，相信亦到過澎湖列島，並於島上巧遇台灣高山族人（時稱「東番」）。鄭和當然不放過「招諭」之機，但對方不受招諭而「遠竄」，即遠走高飛。

## 敘述荷蘭人在台辦學及傳教

另一方面，方豪在書內第十篇以「荷蘭人的侵佔台灣」為題，敘述荷蘭人佔台期間的各方面作為，例如向土著傳授「紅毛字」以及在台傳教及興辦教育。他在篇內指出，來自荷蘭的牧師，隸屬荷蘭東印度公司，而公司以營商行政為主，以傳教為副。由於原住民族十分強悍，荷蘭人為了方便馴服土著，於是採取傳教與教學並重的手法。

荷蘭人抵達台灣三年後，隨即建立教堂，並於一六三六年創辦學校，收納原住民（時稱「土番」）為學生。教師在校內以拉丁文

的拼音記法錄番語，荷蘭人稱此為「新港語」，漢人則稱之為「紅毛字」。荷蘭教士將荷文書籍譯成羅馬注音的番語譯本，而土著學懂紅毛字後，一切公文及法律文件，均用「紅毛字」。當時荷蘭人推行教育的地方，分布於台南、新港等南部地區，而其後驅逐了佔據北部的西班牙人後，在淡水、桃園、鷓籠（即基隆）等地辦學。

其時，荷蘭人所辦的基督教學校，所授科目計有：主禱文、使徒、十誡、早禱、晚禱、謝飯禱告，教理彙編、讀書、習字。不過，此等辦學模式，成效不彰。方豪引述一六五四年駐台長官向荷蘭東印度總督的匯報：「認為教會事業令人悲觀。青年對於教義、僅像鸚鵡學舌，死記硬背，但對於教義內容，不甚了解。」該名長官並向總督建議，傳教士須居台十年，以便熟習當地語言；不入教會學校的土著，不應該施加嚴罰，即不應罰繳鹿皮；須增派傳教士，由當時三名，增至七名。

此篇文章對於讀者瞭解台灣在荷蘭時期的情況，特別是荷蘭人如何辦學及傳教，很有幫助。

誠如一眾弟子在書內「後記」所言，此書是「老師長期研究台灣史的惟一通論性著作，也代表他對台灣早期歷史的最後見解。」許雪姬在認定乃師對台灣史研究的貢獻時，進一步指出方豪的多方面貢獻，包括：從大陸赴台的歷史學者，只有他能夠投身台灣史研究而確有成就，並可指導後學從事這方面的研究；能夠利用其他學者不熟悉的新資料，甚至外國資料。

讀者只消細閱此書，便知許雪姬所說不差，絕非奉承師尊之言。

## 《紅樓夢西洋名物考》是舊文新編

至於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的《紅樓夢西洋名物考》，一如前述，其實是一篇題為「從紅樓夢所記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的長文連同幾篇較為零碎短文包括信札、評論及弁言的匯編，而這篇長文，早已刊於《方豪六十自選集》內，只不過內地出版社將之抽出，另外刊行。

據方豪親述，這篇長文其實是在民國三十二年所發表的「紅樓夢考證之新史料」一文的增修版。事緣民國三十年秋，方豪在貴州遵義的浙江大學講授十七八世紀中西交通史時，開始研究明末清初傳入中國的外國物品，《紅樓夢》所記的當然也在內。及至前述文章發表後，鑑於學術界友好提出一些疑問，而他亦自覺得有增修的必要，於是將文章大幅重寫，多加增潤，並於一九六九年完成。

## 把《紅樓夢》內西洋物品一一歸類

方豪在文內把《紅樓夢》描述的西洋物品一一歸類，計有：呢布、鐘表、工藝品、玻璃品、機件、美術、食品、藥品、動物，共九類，然後在每類之下臚列各式物品，並加以訂證及解說。

舉例而言，方豪在文內第六節「《紅樓夢》關於西洋玻璃品的記述」，逐一系列述《紅樓夢》裏的玻璃物品，計有：見於西方十七八世紀舞台或貴族府第大廳內的反射鏡（見第五十三回）、大玻璃盒（第四十九回）、小玻璃盒（第五十二回）、玻璃缸（第三十一回）、放於榮禧堂檀案上的玻璃盒、玻璃大鏡、劉姥姥入大觀園時見到的穿衣鏡（第四十一回）、鏡壁（第五十四回）、賈母八旬大慶所收的玻璃屏（第七十一回）、裝於寶玉房間的玻璃窗（第

四十九回）、玻璃燈（第五十三回）、賈母看戲時使用的眼鏡（據方豪推斷，此處的眼鏡，實應望遠鏡。）（第五十三回）。

徐本《紅樓夢》第六十三回記述寶玉為芳官取了一外國名，叫作「溫都里納」，意指金星玻璃。方豪憑藉自己的外語能力，推敲「溫都里納」是法文 vitrine 的音譯。此字源自拉丁文的 vitrum，是指玻璃框，亦即商店門前的玻璃窗櫥。方豪順道指出，紅學專家周汝昌亦認為「溫都里納」即法文 vitrine 的音譯。

方豪隨後在文內就《紅樓夢》作者的外國地理知識、西洋物品的可能來源、曹雪芹先人可能接觸的西人、曾經進入江寧織造署的西洋教士、《紅樓夢》時代的鐘表修理師等課題而各有申述。

整體而言，這篇文章對紅學專家以至《紅樓夢》愛好者來說，很值得一讀。

## 方豪親侄執筆記敘伯父

至於書內的其他短篇文字，都是關乎紅樓夢考證的一些零碎問題。如果你不是紅學迷，恐怕讀之索然。不過，書末所付的短文「我的伯父方豪（代後記）」反而值得閱讀。這篇短文是居於內地的方豪親侄方無曉，應此書出版社邀請，執筆記敘離世之前長居台灣三十年因而兩地相隔的伯父，聊作「代後記」。

據方無曉憶述，他一生從沒有機會與伯父見面。關於這位在學術界與宗教界均享盛名的伯父，僅從他爸爸口中得知鱗爪。然而，他深深記得，這位伯父如何從年輕時就十分關顧弟弟，處處眷顧他。及至自五十年代起兩地相隔，仍不時請託居港親友接濟弟弟一家。其實，這雙苦命兄弟一生真正相聚相愛的歲月並不多。



當讀到方無曉憶及伯父接濟弟弟一家之事，實在令人感傷。方豪每次託人帶回內地的金錢，只有一百元。只給這個小數目，不是因為方豪本身貧窮，自顧不下，更非生性守財，而相信是擔心對方如果收到巨款，反而惹來不便。愛弟之情，不表自明。可憐這雙兄弟，離世前仍無法重逢一聚。閱讀至此，怎不叫人鼻酸？

短短の後記，讓我們從親侄（也代表着父親）對方豪的側寫，瞭解這位哥哥及伯父在兩岸分隔的歲月，如何顧念親情。

### 牟潤孫指出方豪治學的優越條件

另一方面，方豪好友牟潤孫在一九六九年應邀為對方的《方豪六十自定稿》作跋時指出，方豪做學問功夫有幾項優越條件。首先，他精通拉丁文，大大有助於研究中西交通史；其二，他善於利用環境，無論身處何地，都善用當地的學術資源，增進自己的學養；其三，他的「所有立論，均依循極細密的考據而成」；其四，他「身為一個中國神甫，作一個中國史學家，對於傳統文化，盡了他應盡的責任。」

牟老師這四點評價，相信同儕後學均表認同，而我們憑藉他親侄的憶述，好友的評價以及一眾弟子緬念乃師之情，對方豪在親情、學問、授徒等方面有清楚的瞭解。

方豪居台期間，一如前述，除執行教會職務，亦設帳授徒，因而欣見「晚有弟子傳芬芳」。隨後成名的歷史學者有前述張秀蓉、許雪姬、趙雅書、張勝彥、李東華等，而弟子當中以李東華仰承教澤最久，而且深得學林稱道。他年輕時，先後在政治大學及台灣大學侍師十多年，深得乃師訓誨，並仰蒙傳授「歷史專題研究法」，以及親自體驗師徒授受的「近身之學」。他為了準備勾畫乃師生平

及畢生成就，特意走訪方豪的杭州故里以及浙江大學、上海復旦大學以至京津等地，並有幸獲得方豪居台時唯一親人即表妹方雲霞珍藏對方的私人函件、文稿及朋友之間的書牘。他亦參照了其他資料，然後寫成「方豪先生年譜」及其他文章。

### 慶有《方豪的生平與治學》傳世

二零一零年李東華在未及花甲之年遽然辭世。遺孀關玲玲為秉承丈夫遺志，於是連同兩三好友，合力整理遺作，並據此編成三書。其中之一是有關乃師的《一位自學史家的成長——方豪的生平與治學》（臺大出版中心，二零一七）。此書其實是李東華生前撰寫乃師的各款文章匯編。書內共分四個單元，合共十一章。第一單元論述「方豪及其近身之學」；第二單元記敘「民國學術網絡中的方豪」；第三單元專論方豪的宗教信仰及教會司職，題為「牧職因緣」；最後單元載列「方豪年譜與著作目錄」。

對於香港學子來說，方豪是位先居內地後居台灣而似乎與香港毫不相關的學者，但只消翻閱此書第六章「方豪與香港學界的交往及其影響」，就知道原來方豪雖然沒有定居香港，但與香港學界過從甚密。

其一，六十年代中，時任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吳俊升，該院歷史系系主任孫國棟，以及好友牟潤孫，邀請方豪前來新亞書院任教。可惜，最後因為方豪本人健康不佳而作罷。其二，方豪與珠海書院關係密切。事緣珠海文史研究所羅香林所長起先有意邀請方豪擔任該所文學院院長，但方豪礙於當時在台教務繁忙，未便分身而婉拒。及後羅香林離世，方豪應允承接對方遺下的研究生指導工作。李志剛、李德超等人，就是得到方豪指導而隨後學業有成的學生。

《一位自學史家的成長——方豪的生平與治學》是現今有關方豪其人其學的最詳盡彙編，也是研究方豪最為便捷的單行書，很值得捧讀。今天師徒二人雖已先後辭世，但此刻細意翻閱此書，仍可輕啖學林師徒傳承的甘醇甜美。

不過，方豪留給我輩學子的各式論著，始終以《中西交通史》至為重要。如果大家有興趣認識中西交通史以至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學者在這方面的成就，可把方豪、向達、馮承鈞、張星烺等名家的各款論著一並閱讀，庶幾可矣。

(二十世紀文史名家系列之七)

(配稿)

## 虔誠教徒 精通拉丁文

貫穿方豪（一九一零至一九八零）一生，有兩個身分。其一固然是歷史學家，其二是虔誠天主教徒兼神職人員。

表面看來，這兩個身分並不沾邊，但其實是千絲萬縷。據悉，他自上世紀二十年代即少年時代起，就在杭州的修道院學習拉丁文，並自修文史；其後進入寧波的神學院，為日後的侍工裝備自己，一邊學習神學，一邊精研拉丁文，為日後研究中西交通史鋪路。

研究中西交通史最大的困難，不是搜羅史料而是文字問題。以一般華籍史學家而言，精通英文甚至德文、法文，已經十分難得，但用之研究西域以至西亞交通史，助力不大。方豪乘着深諳拉丁文之便，處理資料時格外暢順。須知西洋記載西域及西亞交通史，常用拉丁文以至意、西、葡等衍生自拉丁文的文字。只要你通曉拉丁文，拉丁語系內的幾個大型語種，就不難掌握。這種語文優勢加上方豪嫻熟天主教來華史，由他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確事半功倍。



學  
林  
塵  
紓

踏  
樂

作者：塵紓  
編輯：Joyce Shum  
設計：4res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印刷：New Artway Printing Production Ltd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23 年 12 月  
上架建議：文史  
ISBN：978-988-8822-66-9  
定價：港幣 97 元正／新台幣 390 圓正



- 書內有所提述的名家，儘管享譽學林，但按我多年觀察，未必位位堪稱楷模；當中有些反而大有商榷之處。……凡此觀察，都寫在相關文內，期與讀者共鑑。慶幸並非久廁上庠，否則未必可以如此順乎學術良心，秉乎士子良知，說一些很多學者都不敢說的話。拙作的本意，正正是要說一些了無畏懼的良心話。殷冀大家互勉互進，在各自崗位敬誠其事，同心仿效先輩前賢，為這個早已扭曲至不成常形的世界，多傳木鐸，盡振金聲。如此，學林幸甚，蒼生幸甚！（「序」）
- 以上引文，固屬吳梅應得的評價，亦是汪師對於本屬一體的曲學分裂成不同範疇的哀鳴。每當捧讀此文，總難禁慨然浩嘆。老師這篇短文，的確道出不少重要資料及寶貴看法，可惜此文知者極少。其實，更可惜的，是老師的學問與論著，近年知者也極少。為此，謹藉拙文，聊予弘揚，稍履弟子之責。（「常念吾師汪經昌」）
- 提起徐師，當年整個學術界都知道，他最愛罵人，而且是誰人都罵。哪怕你是誰，只要你在他眼中有任何重大缺失，他都罵。當年掌權者及政界強人，他敢罵；文化名人，他當然罵；教授專家，他固然罵；學界翹楚，他更罵，而且每罵必狠。徐師罵人的方式，當然不像一般潑婦莽夫，而是依據學術常識，發文質疑對方，令致被罵者語塞詞窮，無法應對，只有捱罵的份兒；……每讀及此，頓覺有趣。（「遙念吾師徐復觀」）
- 好一句「成功不必在己」，正正反映這位史家的定位，堪堪展現這位學者的胸襟！人生於世，為他人種下根苗，為後輩開闢路徑，不也是美事一樁？……回望老師一生，他那種不求聞達，澹薄自甘，不嫌刻板的治學精神，何嘗不是另一位呂思勉？何嘗不使人景仰崇敬？（「嚴耕望史學卓然大成」）
- 再次感謝老師當年的冷冷一眼，促使筆者敬誠史學。（「敬憶吾師全漢昇」）

ISBN 978-988-8822-66-9



9 789888 822669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sup>o</sup>E.

上架建議：文史

定價：港幣 97 元正 / 新台幣 390 圓正